

※書目文獻※

關於錢德洪的文獻學調查與研究

錢 明 *

一、著述失傳

大凡治王學者，都不會忽視那位曾在天泉橋上、七里灘頭¹與王畿辨學論道的錢德洪（緒山，1496-1574）。緒山「雖經濟之業，未及概見」²，但在陽明學中的地位卻是無人可比的。他不僅與王陽明同故里、同生於瑞雲樓³，而且都以餘姚諸氏為妻⁴，子孫聯姻⁵，其父錢蒙心漁翁則是陽明所傾心的地方賢達⁶，而其家族成

* 錢 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¹ 即著名的「天泉辨正」和「嚴灘復申」（又稱「嚴灘請益」），見方祖猷：《王畿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4-110。

² [明]王畿：〈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簡稱〈緒山錢君行狀〉），《王龍溪先生全集》（清光緒七年重刻本），卷20，頁1。

³ [明]錢德洪：〈後瑞雲樓記〉，錢明編校整理：《徐愛·錢德洪·董漸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70。後陽明長孫王承勳自號「瑞樓」（見[明]沈德符：〈嗣封新建伯〉，《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5，頁145），又編有《瑞雲樓集》（見〈藝文〉上，《餘姚縣志》〔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卷17，頁31），似有紀念祖父王陽明和師祖錢緒山之意圖。不僅如此，甚至緒山出生時其母親的夢兆亦「與陽明同，相傳以為奇」（〔明〕呂本：〈明故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公墓誌銘〉（簡稱〈緒山錢公墓誌銘〉），《徐愛·錢德洪·董漸集》，頁415）。據〈三祠傳輯〉載：「弘治丙辰，祀灶前夕，德洪母夢祥雲款款空中，呼認太乙，而德洪生。」（見〈列傳〉九，《餘姚縣志》，卷23，頁11）王畿的〈緒山錢君行狀〉對此事亦有詳細記述。

⁴ 王陽明外舅諸讓，字養和，號介庵，成化乙未進士。弘治元年陽明娶諸讓長女為妻。諸讓卒後，陽明於弘治八年和正德十六年分撰祭文二篇（見〔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整理點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957、1212）。後陽明又分別為諸讓妻張氏、子諸繡、孫諸袞寫過〈祭張淑人文〉、〈南野公像贊〉和〈白野公像贊〉（同前書，頁1213-1214）。另外陽明還寫過〈寄諸用明〉、〈書諸陽伯卷〉、〈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為別〉（同前書，頁147、277、739）等詩文，可見陽明與諸氏家族的關係非同一

員亦大都在他的影響下成為陽明的追隨者或信奉者⁷。更主要地，他曾為陽明著作的收集編纂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⁸，儘管在這一過程中也暴露出他作為心學家對文獻編纂學之客觀性的忽視和疏遺⁹。然而，在陽明後學中，又數錢德洪的研究最

般。而緒山的前妻即為餘姚開元鄉的「舊族」諸敏惠（即〈緒山錢君行狀〉中所謂的「朱孺人」，「諸」為「朱」字之避諱）。或許正是因為諸敏惠與陽明外舅家族有親緣關係，才使得緒山從追憶恩師的心情出發，為前妻既作〈行狀〉又撰〈墓銘〉（見錢德洪〈明故先妻敏惠諸孺人墓誌銘〉），這種情形在王門中是不多見的。另據張元忭〈工部主事餘姚諸公行狀〉：「今海內譚《易》者，並推姚江，而諸氏尤號專門。」（〔明〕張元忭：《張陽和先生不二齋稿》〔明萬曆二十一年張汝霖家刻本〕，卷 12，頁 31）這裏所說的易學專家諸公與上面所說的餘姚諸氏究竟有何關係，尚不清楚，但陽明、緒山皆精易學，又皆與餘姚諸氏家族關係密切，這恐怕不能說是偶然的。

⁵ 王陽明繼子正憲之女是錢德洪次子應樂之妻（見錢德洪〈明故先妻敏惠諸孺人墓誌銘〉）。錢應樂，「舉人，三為縣令，而居業蕭然，無忝家學」（〈三祠傳輯〉，見〈列傳〉九，《餘姚縣志》，卷 23，頁 11）。應樂對家學的貢獻，也許就在於編輯出版了印數極少的《緒山會語》（詳見後述）。

⁶ 錢蒙，字希明，人稱四然翁，晚慕嚴子陵之操，別號心漁，陽明弟子馬明衡曾為之傳。事見鄒守益：〈四然翁贊〉，《東廓鄒先生遺稿》（民國十五年胡慶道重印本），卷 10；程文德：〈心漁小引〉，《程文恭公遺稿》（明萬曆十二年程光裕刻本），卷 13。

⁷ 如其弟錢德周（字仲實，嘉靖二十二年舉人）、族兄錢大經（嘉靖十年舉人；案：《餘姚縣志》稱「從子」，有誤）、侄子錢應揚（字俊民，號後峰，嘉靖十四年進士，廣東巡按。乾隆《餘姚縣志》案：應揚長於說經，歸安茅坤師事之白華樓，著有《尚書說意》，《後峰存真稿》六卷。其逸事可參閱〔明〕焦竑：《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038；〔清〕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240；《餘姚縣志》，卷 17）曾先後就學於王陽明（見《王陽明全集》，頁 1292、1334）。此後其長子應度（緒山嘗曰：「應度幼篤聞道，早輔吾學，同遊日親，臨沒有悟，輒志而往。」見〈明故先妻敏惠諸孺人墓誌銘〉），次子應樂、侄子應量、應禮，以及女婿鄭安元、侄女婿葉邁等，又於嘉靖二十九年開始定期會於溧陽之嘉義書院，春秋奉祀陽明（《王陽明全集》，頁 1337）。由此可以說，在陽明門徒中，家族性的整體參與活動，惟有江右的鄒東廓家族（東廓祖孫三代都信奉王學，其家學深為耿定向所羨慕〔見耿定向：〈河南按察司僉事鄒伯子墓誌銘〉，《耿天臺先生全集》（民國十四年武昌正信印書館刊本），卷 12〕）、淮南的王心齋家族（心齋五子「皆有立」見李贅：〈理學名臣·心齋王公傳〉，《續藏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22）以及揭陽薛中離家族、新建魏水洲家族等，才能與錢緒山家族相媲美。惟緒山家族只是參與，要說學術貢獻，則不可能與東廓家族和心齋家族同日而語。

⁸ 見拙作：〈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王陽明全集》，頁 1632-1648；鍾彩鈞：〈錢緒山及其整理陽明文獻的貢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8 卷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69-89。

⁹ 陳來在〈《遺言錄》與《傳習錄》〉一文中曾就錢德洪所編纂的《傳習續錄》之種種遺誤進行

為棘手，這主要是由於缺乏第一手文獻資料所致。無論是其次子錢應樂編的《緒山會語》二十五卷¹⁰，還是其弟子徐用檢編的《緒山先生續訓》¹¹或後學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與緒山裔孫集生摘編的《錢緒山先生要語》¹²，以及乾隆《餘姚志》所記的《緒山語錄》一卷¹³，今俱已失傳。

關於緒山著作的主要內容，呂本在〈緒山錢公墓誌銘〉¹⁴中曾有詳述：

了指正（見陳來：《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589-604）。此外，在緒山所編纂的《文錄》、《詩錄》及《年譜》等文獻中也有不少遺誤（見拙作：〈譜牒中的王陽明逸文見知錄〉，張新民主編：《陽明學刊》第1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拙作：〈新發現的十六篇王陽明佚詩文〉，張新民主編：《陽明學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¹⁰ 《明史·藝文志四》和《餘姚縣志》所錄的《緒山文集》二十四卷，疑即《緒山會語》二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儒家類存目二〉錄《緒山會語》曰：「是編為其子應樂所刊，前四卷為會語、講義，五、六兩卷為詩，七卷以下為雜文，第二十五卷則附錄墓表、誌銘。雖其詩文全集，而大致皆講學之語，故仍總名曰『會語』。今亦著錄於儒家焉。」（頁812）可見，名為「大致皆講學之語」的「會語」，實則涵蓋詩賦、雜文等的「詩文集」。故筆者推測，《緒山文集》二十四卷本即為去掉了第二十五卷附錄後的《緒山會語》本。

¹¹ 〔明〕沈懋學：〈答徐魯源〉，《郊居遺稿》卷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163冊，頁610。

¹² 〔明〕劉宗周：〈錢緒山先生要語序〉，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籌備處，1998年），第3冊，頁697-699。案：張如安說：「此本（即《錢緒山先生要語》）或即光緒《餘姚縣志》所錄之《緒山語錄》一卷」見〈錢德洪佚文補輯〉，《中國哲學研究通訊》第16卷第3期（2006年9月），頁77。據《姚江書院志略》載：「緒山錢子有《論學書》數十卷，徵士（王朝式）摘其粹者為《要語》，呈劉子。劉子曰：『何儉乎？』徵士曰：『先生之書，雖不止是，而教法已備。陽明子云德洪接下根，殆為吾儕而設。』劉子曰：『有是乎？其下也，乃所以為上也。學者欲求端於陽明子之言，亦可謂善學者也。』（卷下〈王徵士傳〉，見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冊，頁266-267）既然是從數十卷《論學書》中摘錄出來的，故疑《要語》與《語錄》並非一書。

¹³ 見《餘姚縣志》卷十七〈藝文〉上。案：原文僅記「《緒山語錄》一卷」，除附有陸世儀的一段重要論述外，再無其他評語。陸氏認為緒山「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並聲稱「姚江弟子吾必以緒山為巨擘」。

¹⁴ 據《餘姚縣志》卷十五〈塚墓〉載：「徐階撰墓誌，呂本撰墓表，門人蕭良幹題曰『大儒緒山先生之墓』。」（頁23）然徐階所撰緒山墓誌未收於《世經堂集》。北京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雖藏有《世經堂續集》（十四卷，明徐肇惠刻本）的殘缺本，其中的卷四至卷五為墓誌銘，收有徐階為其僚友後學等所作墓誌、墓表四十四篇（見姜德成：《徐階與嘉隆政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2-65），然因筆者未見該書，故對書中是否收有徐階撰的緒山

如在韶，則陳豹穀延主明經書院；溧陽，則史玉陽聘主嘉義書院；宛陵，則劉初泉聘主獅子巖與水西精舍；蘄州，則沈古林聘主崇正書院；江右，則督學王敬所大闢講舍於懷玉山，群八邑士，聘公爲山長。若沖玄，若斗山，若青原，若君山，若福田，若衢麓，若復真，若復古，諸書院往來敷敎二十年，不可枚舉，各有《規約》，有《會語》，凡若干卷，載公《全集》中。¹⁵

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有關緒山學說以及涉及陽明後學講學運動的珍貴史料，只有極小部分還能從史志中找到。

至於緒山著作的失傳年代，據筆者推測，至少在清光緒年間甚至光緒之前就已失傳。因為除王道明編纂的《笠澤堂書目》所錄「《緒山集》八冊」屬明人之作外，清初黃虞稷編纂的《千頃堂書目》及雍正年間定稿的《明史·藝文志》¹⁶，均載有《緒山集》二十四卷；而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則錄有《緒山會語》二十五卷，並明言是「江蘇周厚堉家藏本」。由此可推知，在清康乾年間緒山著作應尚存於世¹⁷。此前的康熙二十九年冬，邵廷采撰〈刻姚江書院志略端由〉亦稱：「既又念先大父貯明儒書甚富，自文成王子以下，曰仁、緒山、東廓、南野及

墓誌銘，不敢枉斷。據筆者推測，墓誌應是呂本所撰，徐階撰寫的可能是墓表，縣志恐張冠李戴矣。

¹⁵ 呂本：〈緒山錢公墓誌銘〉，《徐愛·錢德洪·董漸集》，頁418。

¹⁶ 黃虞稷，字俞邰，福建泉州人，家居南京，生於崇禎二年，卒於康熙三十年。黃虞稷父子聚書兩代，在其父黃居中千頃齋六萬餘卷藏書的基礎上，黃虞稷又增益數千卷，並編成《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該書目主要收錄的是明人著作。康熙十八年清政府開明史館，經徐元文薦舉，黃虞稷入明史館負責編修《明史·藝文志》。由於明代沒有一部像樣的政府藏書目錄，故黃在編修《明史·藝文志稿》時所依據的主要是自己編纂的《千頃堂書目》。後明史館總纂修官王鴻緒又在黃稿的基礎上做了刪改，而由張廷玉定稿的《明史·藝文志》，基本上就是王鴻緒刪改過的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之翻版（參見高路明：《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73-180）。因此，《明史·藝文志》所著錄的《緒山集》實即來源於《千頃堂書目》。

¹⁷ 對此，筆者還可舉出一證：據楊爵後裔紹武《復楊斛山書》識語：「此錢先生復書也，出先生《會語集》（即《緒山會語》）中。先生繫獄數年，與公同講學圜中，〈處困記〉（楊爵撰）稱其為同志舊友，則夫未入獄，既入獄與夫既出獄，其往來論訂亦非一二言明矣。而概同佚闕，可勝嘆歎！」（〔明〕楊爵：《楊忠介集·附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5冊〕，頁154）這不僅說明紹武是見到過《緒山會語》的，而且還可看出緒山著述的「佚闕」之程度。

蒙泉《燕詒》之錄，靡不鉤元提要。每月學會，必手書先儒語，共相問答。」¹⁸ 然到光緒年間重修《餘姚縣志》時，對錢氏所著書目的評述，僅轉引了《四庫全書總目》或清初學者陸世儀之評語，而未發表編者個人的任何意見。這或者是編者有意「偷懶」，或者是編者無緣看到原書而避免妄加評論。而從編者在同書中對王陽明等人之著作所做的評論推測，似乎後者的可能性更大。正因為失傳時間較早，所以近人繆荃孫等編纂的《嘉業堂藏書志》，雖著錄嘉業堂藏書盛期所藏善本古籍一千七百餘種，其中所收明人文集甚富，然惟獨不見有關錢德洪著作之記載。還有近人宋慈抱的《兩浙著述考》，在著錄《緒山會語》時，亦特地注明是轉述了《四庫存目提要》。

令人費解的是，為何王陽明的高足弟子和重要傳人的著作幾乎都保留或部分保留了下來，而惟獨錢德洪的主要著作《緒山會語》那麼早就失傳了？這其中是否有什麼原因值得總結呢？我們知道，《四庫全書》雖未收錄《緒山會語》，但其編纂者卻將錢著編入子部儒家類¹⁹，而像《東廓集》、《南野集》、《世經堂集》甚至《王文成公全書》等則無此「待遇」，皆被錄於別集類。可見，《緒山會語》與被同樣編入子部儒家類的東林學者顧憲成的《顧端文公遺書》等明儒著述具有等同之地位，不存在被清政府銷毀或輕視的可能性。而憑錢德洪在王學中的地位，其著作亦必定會是王門後學的必讀書之一，故亦不存在同門保存不善的問題。那麼究竟是何原因使《緒山集》失傳的呢？

猶如前述，在陽明門人中，除了徐愛，就數錢德洪與陽明的「私交」最為親密，而且這種「私交」還帶有濃重的親情成分。這一方面固然為錢氏傳播陽明學說提供了方便，但同時卻又成為限制錢氏思想創新的重要原因。陽明去世後，錢德洪即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和整理陽明著作以及重評先祖、保護家廟方面，與王畿相

¹⁸ 《姚江書院志略》卷首，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9冊，頁266-267。案：「先大父」指邵廷采祖父魯公公曾可。廷采「九歲隨魯公入姚江書院見沈國模……十一歲從魯公公講業于皇山翁氏莊」（〔清〕邵廷采著，祝鴻傑校點：《思復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35），對祖父藏書甚為熟悉，緒山又是其相當推崇的姚江先儒。是故對緒山著作，廷采會倍加珍愛。後邵家所藏的《緒山會語》，隨著姚江書院在乾隆以後的衰落而遺失或被焚的可能性較大。

¹⁹ 需要指出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是在承認《緒山會語》為「詩文全集」的前提下，將其歸入儒家類的（見註10）。這體現了編纂者對緒山的另眼相看，並且與緒山門人蕭良幹在其墓碑上題曰「大儒緒山先生之墓」的良苦用心，有某種相似性。

比，外出講學的時間本來就不多，加上他在浙中活動時又把開放的學術活動過多地局限於家族內部²⁰，一心篤於「慕祖敬宗」的「親親之義」，以至於門人說他是「本祖而生，顧祖而死」，「數十年來稱於宗族鄉黨者」尤多²¹。這就導致了同門與緒山之間較深的疏離感，比較而言，為他撰寫序跋、祭祀類文字的弟子師友在王門中可謂最少²²，明人文集中惟見王畿所撰的〈行狀〉和呂本所撰的〈墓誌銘〉，反倒は其父錢心漁，依靠與陽明門人的廣泛聯繫和錢德洪的當面索求，而得到了包括湛甘泉在內的諸多名士的褒獎和祭奠。因此，筆者的結論是：既然《緒山會語》由其次子錢應樂所編，而且與其他王門弟子相比錢德洪的門人後學又比較少²³，所以其

²⁰ 據張岱說：「明嘉靖三十九年，督撫胡宗憲建（錢王）祠於（杭州）靈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孫德洪者守之。」（〔明〕張岱著，夏咸淳、程維榮校注：《西湖夢尋》，《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42）所以到晚年，緒山的注意力已有所轉移，每「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沒，故凡遺墓在臨安、錢塘、崇德、天臺者，罔不表章恢復。又請建英烈廟於越，表忠觀於杭，立表忠世廟於勝歸山，置祭田，修祀事，每歲仲秋，大會臺、杭、蘇、越族屬二十餘支，合祭表忠觀後寢，以聯族誼，具載《吳越世家》，是公無一日而忘親恩也」（呂本：〈緒山錢公墓誌銘〉，《徐愛·錢德洪·董漸集》，頁419）。而且還把在杭州天真書院開展的講學活動，也納入到彰顯先祖功德的祭祀聯誼活動中，以至無暇顧及其他地區的講學授徒。於是，嘉靖二十七年，鄒守益想趁緒山遠聚青原的機會，邀請他來與「同志因緣一晤，可以圖除舊布新之策，使至，收手劄，知復不遂」（鄒守益：〈答劉崇直〉，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677）。嘉靖四十一年，羅洪先為考訂《陽明年譜》稿而希望他來懷玉「復聚」，然他卻「久之無來耗，遠承書問，始知又留天真也」（〔明〕羅洪先：〈與錢緒山〉，《石蓮洞羅先生文集》〔明萬曆四十四年陳於廷敘刻本〕，卷9，頁27）。仔細想來，在編纂陽明著述和表彰先世功德這兩項工作之外，我們確實也很難再要求緒山能把過多的精力投身於別處的講學運動。

²¹ 見呂本：〈緒山錢公墓誌銘〉，《徐愛·錢德洪·董漸集》，頁419。

²² 值得注意的是，甘泉學派的湛若水和洪垣曾分別撰寫過〈贈掌教錢君之姑蘇序〉和〈錢緒山壽序〉，前者見於通行本《湛甘泉先生文集》，而後者已佚，僅被略摘於《明儒學案》（見〔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冊，頁221）。另外，湛若水與其門人錢徽還為緒山父心漁翁撰寫過墓銘、像贊和詩序。這些都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緒山與甘泉學派的緊密聯繫（詳見拙著：《浙中王學研究》第6章，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

²³ 萬斯同《儒林宗派》記載於錢德洪門下的僅有九名：「徐用檢（克賢，魯源，蘭溪）、羅大紘（公廓，匡湖，安福）、查鐸（子警，毅齋，涇縣）、蕭彥（念渠，涇縣，定肅）、蕭良幹（以寧，拙齋）、程大賓（汝見，心泉，歙縣）、王守勝（以敬，德興）、吳林（用茂，歙縣）、杜質（惟誠，太平）。」（卷15，頁315，民國二十三年張氏約園《四明叢書》本）

著述主要限於家族或餘姚邑內傳播的可能性極大²⁴；而家族衰微，流傳不廣，（姚江）書院被毀，則可視為《緒山會語》失傳的主要原因²⁵。

錢德洪著作失傳所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在此僅舉一例：錢德洪是陽明以後講學活動的領袖級人物，故其著作均以「會語」稱之，其中肯定保存了各地講會活動的大量資料，但由於《緒山會語》的失傳，使我們不僅難以全面瞭解錢氏本人真實的思想面貌，而且對陽明之後周汝登之前的紹興、餘姚等地講會活動的實況也知之甚少。比較之下，倒是江右王門因其主要人物的著作大都被保存了下來，因此使我們今天在對江右王門進行梳理與研究時，反而比陽明學的發祥地浙中感覺遊刃有餘。

既然錢德洪的主要著作到清代晚期就已失傳²⁶，所以近代以來大凡研究陽明學的人，在述及錢德洪時，只好以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和《王陽明全集》中所附錄

²⁴ 據劉宗周〈錢緒山先生要語序〉記載：「先生有裔孫集生氏，頗能讀先生遺書，猶念先生之教不盡行於後世也，因出舊編，請政於予。」而宗周實際上也並不清楚緒山論學書究竟有多少卷，只是含混地說：「固嘗有論學書數十卷……予後進識淺，愧未窺先生萬一。」（《劉宗周全集》，第3冊，頁697-699）說明筆者關於緒山著述僅限於家族內傳播的推測並非妄斷。正因為如此，才使得緒山在當時的影響力有逐漸衰減的跡象，猶如陶望齡所言：「人知龍溪先生妙得師傳，而於緒山語殊闇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於是。」（〔明〕陶望齡：〈與餘山陰舜仲十首〉之十，《歇庵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卷15，頁2221）至於緒山在晚明的陽明學界被邊緣化的原因，可詳見拙著：《浙中王學研究》第6章，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

²⁵ 黃宗羲在談到數百年來餘姚之詩文集「不勝其逸者之多」時，曾列舉了兩條理由：一是「科舉抄撮之學，陷溺人心，誰復以此（指詩文集之編撰）不急之務，交相勸勉」（《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10）；二是「姚江之為富貴者何限，即有子孫，守其遺集，裝潢投贈，偶揭一二板，便嘔嘔棄去，以充糊壁覆瓿之用者不少矣」（同前書，頁14）。儘管梨洲所言的這兩條理由並無普遍性可言，但若藉以作為對緒山著作失傳的解釋，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²⁶ 據筆者所知，現僅存《平濠記》一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載《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49冊，頁147-153。《四庫提要》稱：「王守仁之平宸濠也，其大綱具於敘功疏，其細目具於《年譜》。德洪受業守仁，據師友所見聞，其陰謀祕計及一切委曲彌縫之處，有疏及《年譜》所不詳者，因作此記以補之。凡黃綰所說四條，龍光所說二條，雷濟所說一條，附載德洪隨事附論者五條，又自跋一條。」（〔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482）然《平濠記》的內容大部分與附錄於《王陽明全集·世德記》中的〈征宸濠反間遺事〉相同，惟有黃綰、蔡文所記部分的錢德洪之附論未見於〈征宸濠反間遺事〉。鍾彩鈞認為，前者「當係後者的初稿」（〈錢緒山及其整理陽明文獻的貢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第3期〔1998年9月〕，頁81），余以為是。

的緒山文字為基本資料，也就不足為奇了。近幾十年來，國內外學術界有不少學者都在用心尋訪《緒山會語》等錢氏所遺著作，但不是一無所獲，就是查無實據²⁷。因此，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初日本學者吉田公平教授在編寫《陽明門下》中的錢德洪部分時，遂開始了艱難的輯逸工作，編成《錢緒山遺文抄》，輯有語錄五十條、書簡序說二十四篇²⁸。葉樹望研究員於九〇年代初，從《餘姚縣志》和《姚江逸詩》²⁹中輯出記文墓誌二篇、詩二十二首³⁰。新世紀伊始，彭國翔教授又在《錢緒山遺文抄》的基礎上，補充了未被吉田公平輯錄的語錄五條、序文一篇，並對所有六十條語錄做了詳細校注³¹。稍後，張如安、永富青地教授又另闢蹊徑，新輯語錄一條、講義一則、文或略文十二篇³²。上述四位學者尤其是吉田公平的努力，為學術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比如吳震教授撰寫的數篇有關錢德洪研究的論文，以

²⁷ 比如筆者在上世紀九〇年代初曾根據紹興市方志辦傅振照先生所提供的線索，專程到紹興等地尋訪《緒山會語》，但結果卻令筆者大失所望，就連該書的蹤影也沒見到。

²⁸ 見宇野哲人、安岡正篤監修：《陽明門下》上，《陽明學大系》（東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卷5，頁409-432。其中從《明儒學案》中輯出語錄十九條、書簡十一篇，從《王門宗旨》中輯出語錄二十九條、書簡三篇、序說二篇，從《聖學宗傳》中輯出語錄二條，從《王文成公全書》中輯出書簡二篇、序說二篇，另從佐藤一齋《傳習錄欄外書》中輯出〈續刻傳習錄序〉（原為閻東本《傳習錄》所收）一篇，並附錄了王畿的〈緒山錢君行狀〉。

²⁹ 黃宗羲編，清康熙五十七年南雷懷謝堂刻倪繼宗重修本。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00冊雖有收錄，然因缺頁而少了有關錢德洪的內容。

³⁰ 二松學舍大學陽明學研究所刊：《陽明學》（東京：明德出版社，1993年），第5號，頁92-98。

³¹ 見〈錢緒山語錄輯逸與校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2期（2003年6月），頁13-56。彭氏從吉田公平未見的池上客的《證心錄》（日本內閣文庫藏）中輯出三條語錄，又從《王門宗旨》和《聖學宗傳》中輯出五條語錄（這五條語錄的內容均能從吉田公平輯於《陽明年譜》之〈天成篇〉和《王門宗旨》之〈復楊斛山書〉中找到），並且經過互校，還從《王門宗旨》和《聖學宗傳》中輯出被吉田公平忽略的二條語錄和一篇序文（即〈賀程後臺序〉）。

³² 參見張如安：〈錢德洪佚文補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6卷第3期（2006年9月），頁77-93；永富青地：〈錢德洪《朱子晚年定論》について〉，《人文社會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會，2007年），第47號，頁5-15。其中張如安輯文錄十篇，篇名為：〈終命〉、〈舟過札〉、〈省方亭記〉、〈陽明師與晉溪書跋〉、〈倪小野突兀集跋〉、〈程溥傳〉（略）、〈符氏雙節傳〉（略）、〈慈節傳〉（略）、〈王節婦傳〉（略）、〈陸節婦傳〉（略）；永富青地輯文錄二篇，即〈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和〈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

及日本二松學舍大學陽明學研究所一九九三年編的《陽明學》「錢德洪特集號」等，便是以《錢緒山遺文抄》為基本資料的。

二、佚文新輯

儘管如此，相比王陽明的其他傳人，由於缺乏原始文獻的支持，有關錢德洪的研究，仍顯得步履蹣跚，難以深入。為此，筆者近幾年在主持浙江省社科院的重大課題《陽明後學文獻叢書》時，在錢德洪等人著作的輯逸上用力甚勤，輯成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錢德洪著作集³³，書中收錄緒山語錄九十四條，其中《陽明學大系》和彭文輯逸五十八條³⁴，本人輯錄三十六條（其中十八條見於《王陽明全集》，本文不錄，餘見後文）；文錄六十八篇，即已被《陽明學大系》收錄的二十四篇：〈上甘泉〉、〈復王龍溪〉、〈答傅少岩〉、〈復龍溪〉、〈與季彭山〉、〈獄中寄龍溪〉、〈答聶雙江〉、〈與張浮峰〉、〈與陳兩湖〉、〈復周羅山〉、〈復何吉陽〉、〈復楊斛山書〉、〈與趙大州書〉、〈復袁文輝、屠淳卿、高國重、屠羲民書〉、〈賀黎蛟池序略〉、〈書徐調元卷〉、〈陽明先生文錄序〉、〈陽明先生年譜序〉、〈大學問序・跋〉、〈刻文錄敘說〉、〈天成篇〉、〈續刻傳習錄序〉³⁵、

³³ 見拙編：《徐愛·錢德洪·董漸集》。案：在拙編出版前，筆者尚不知張如安和永富青地教授的輯逸成果，故而未於採納編入，這是拙編的一大遺憾。本文所輯錄的最後兩篇佚文即是由永富青地先生提供的，謹致謝忱。

³⁴ 其中《明儒學案》十九條，《王門宗旨》三十三條，《聖學宗傳》五條，《證心錄》（池上客輯，日本內閣文庫藏）三條。在《聖學宗傳》（第三條）中輯出的一條語錄（《理學宗傳》為第一條），彭文補為第三十五條（見〈錢緒山語錄輯逸與校注〉），其內容與《王門宗旨》卷十所收之〈復楊斛山書〉及《楊忠介集·附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6冊）卷三所收之同名文基本一致。然比較而言，彭文所補第三十五條不僅缺文較多，而且末尾還遺漏了一大段不見於《宗傳》和《宗旨》而見於《楊忠介集·附錄》的文字。後者在其結尾處還附有紹武的一段識語（見註17）。可見，《王門宗旨》尤其是《楊忠介集·附錄》所收的〈復楊斛山書〉較之《聖學宗傳》第三條所錄之內容要完整許多，所以筆者在整理時，選擇了《楊忠介集·附錄》所收的〈復楊斛山書〉。另彭文所收第三十六條，即「汝禮自歎平日多過」條，錄於《聖學宗傳》第七條，而謂「《王門宗旨》無」。其實該條《王門宗旨》錄於卷十四〈龍溪語抄〉中。疑「汝禮」即汝中，為王畿字，故《王門宗旨》將其錄於〈龍溪語抄〉中。

³⁵ 其中《明儒學案》十一篇，《王門宗旨》六篇，《陽明全書》六篇，《陽明年譜》一篇，《傳習錄欄外書》一篇。案：《陽明學大系》所錄〈答念菴〉之一、三，分別見於〈答論年譜書〉之五、十，故本文不錄。之二即本文所錄《語錄》第二十一條。

〈賀程後臺序〉、〈後瑞雲樓記〉³⁶。錄自《王陽明全集》的二十五篇：〈傳習錄中序〉、〈傳習錄中跋〉、〈傳習錄下黃直錄跋〉、〈傳習錄下跋〉、〈朱子晚年定論引言〉、〈文錄續編序〉、〈五經臆說十三條序〉、〈與滁陽諸生書並問答語序〉、〈家書墨蹟四首序跋〉、〈上海日翁書跋〉、〈嶺南寄正憲男跋〉、〈又與克彰太叔跋〉、〈寄正憲男手墨二卷序〉、〈上國遊序〉、〈三征公移逸稿序〉、〈太極圖說按語〉、〈答論年譜書〉（凡十首）、〈師服問〉、〈訃告同門〉、〈遇喪於貴溪書哀感〉、〈稽山感別卷〉、〈謝江廣諸當道書〉、〈再謝汪誠齋書〉、〈再謝儲穀泉書〉、〈征宸濠反間遺事〉³⁷，以及本人補遺的十九篇（見後文）；詩錄三十首，即葉樹望輯錄的二十二首：〈文成祠〉、〈西臺獄懷晴川斛山三首〉（三首）、〈寄龍溪〉、〈獄中遇白樓誕日〉、〈即景〉、〈思龍山絕頂〉、〈睡醒和馮南淮呂芹谷沈南泉壁間韻〉（二首）、〈和劉晴川楊斛山春懷〉、〈和我來圜中行〉、〈富春留別次羅念菴韻〉、〈謁蜀山東坡祠用秘圖韻〉、〈訪唐荊川不遇戲題壁〉、〈遊獻花岩〉、〈用晴溪壁間雪夜韻〉、〈白蓮池〉、〈游三祖寺赴沈古林顧日涯崇正書院之朝〉、〈宿五祖寺〉、〈過五祖寺沮雨〉、〈再上懷玉山〉³⁸，以及筆者所輯的八首（見後文）。

現把筆者輯逸的語錄、文錄和詩錄全文錄於下（個別書劄雖已有學者輯錄，然零星難見，故一併收全），以方便學術界同仁的利用及補遺。文中凡加□者，為原字不清或筆者據上下文補入者。

（一）語錄（言行錄）

1. 宏甫³⁹曰：「順而能達，帝王之政；逆而能忍，老莊之術。才識相配，必本

³⁶ 這兩篇為彭文補錄。案：彭國翔根據余重耀輯錄的《陽明先生傳纂·附錄》，以〈瑞雲樓記〉為題，錄於其所著的〈錢緒山語錄輯逸與校注〉之後。然據《餘姚縣志》卷十六〈金石上〉載：「〈瑞雲樓記〉，乾隆志引萬曆志，樓在龍泉山北……湛文簡若水為之記。」（頁37）故筆者推測：〈瑞雲樓記〉乃湛甘泉所記（未見），而錢德洪撰寫的應稱〈後瑞雲樓記〉。

³⁷ 篇名皆係筆者所加。另還錄有〈平濠記〉一卷，因與〈征宸濠反間遺事〉內容大體一致（見註26），是故本文不錄。

³⁸ 其中第一首見於乾隆版《餘姚縣志》卷十四〈祠祀〉，後二十一首載於黃宗羲輯《姚江逸詩》卷七，見葉樹望：〈王陽明の後學錢德洪について〉，《陽明學》，第5號，頁84-98。

³⁹ 「宏甫」疑即「洪甫」，緒山字，但亦可能是指李贅，字宏甫，故此條當存疑。

領宏深。精魄有用，用不敢盡，安重以不虧疎其氣，非的然以為美，遂厲而致之也。」（方以智：〈世〉，《藥地炮莊》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57冊，頁250）

2. 錢緒山曰：「昧入者明出，塞入者通出，憂憤入者以自得出。」（方以智：〈宗〉，《藥地炮莊》卷3，同前書，頁268）

3. 錢緒山曰：「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窮索聖人之微，而養內者遺外。」（方以智：〈惠〉，同前書，頁284）⁴⁰

4. 吳時來與錢德洪辨格物：緒山書曰，吳「之格物不免名色太多」，吳則三致書辯之，認為緒山：「以（朱）文公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之言為非，蓋未免以文害辭。」緒山又曰：「離物不可以言性」；「心不離乎人情」；「物者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著見出來。格物者，順其帝則之常，不使一毫私意間隔於其中也。」吳則曰：「斯語又覺纏繞矣。」（吳時來：《證道編》⁴¹，見劉斯源：《大學古今本通考》卷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21冊，頁279）

5. 二十五日，會於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後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能容。每日升堂，諸君發明良知與意見之害。退則各就寢，所商榷俱夜分乃罷。予（羅念菴）嘗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過潛伏，且恐陰為之培植矣。」緒山曰：「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倒巢搜賊之法也，勿謂盡無益也。」七月二十三日，解會。是夜與龍溪共榻言別。因請指余之短。龍溪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已而龍溪令余有言。余謂此番對兄，尚覺於人情上牽連不斷，大抵過於厚善，遂致防檢稍疏。此中淡泊得下，即無染著耳。（羅洪先：《夏遊記》，徐儒宗編校整理：《羅洪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⁴⁰ 方以智《藥地炮莊》中錄有緒山語錄，筆者是從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荒木見悟先生的來信中獲知的。

⁴¹ 《證道編》與羅欽順的《困知記》曾一起被時人視為「乃聖賢正法眼藏，為宇宙間不可磨滅之書」（見〔明〕劉斯源：《大學古今本通考》卷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21冊，頁430），足見此書在當時的影響力。

頁 68)

6. 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為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也。」將謂物有本末者，亦有別解歟？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色即為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聲即為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質之龍溪未發之說，則知之為體，蓋自有在，固不必若是之牽合也。或曰：「緒山所言，其諸先生萬物一體之義乎？」（同前書，頁 74）

7. 錢緒山先生自廣東舟返，過螺川，某於舟次聽教，至南浦而別。一日侍坐山寺，方丈某問曰：「何謂心無內外？」時寺僧方在殿叩鐘，緒山先生曰：「今聞鐘時，我不往彼，鐘不來此，而聲聞無間，心無內外可知矣。」某猶未釋然。及歸螺川，問兩峰先生何謂心無內外。兩峰先生曰：「汝謂心有內外乎？且道汝心所管至界到何處而止，若心所管攝無至界、無止處，則此心廓然無際，何內外之有！」某乃豁然有省。（王時槐：《王塘南先生自考錄·嘉靖二十八年癸酉條》〔民國九年刊本〕，頁 12）

8. 遷者緒山、龍溪二兄自湖中臨復古，大聚於青原，考德問業，將稽先師傳習之緒。而精進者寡，因循者眾，是忽實修而崇虛談也。（鄒守益：〈惜陰申約〉，《鄒守益集》，頁 734）

9. 緒山錢子先別而歸，拳拳論有意見之弊，其言曰：「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因語同遊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躋躋，不沾帶一物。意即良知之運行，見即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為意障；倚於見，便為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鄒守益：〈沖玄錄〉，同前書，頁 744）

10. 嘉靖己酉之春，太恭人唐⁴²壽登八十有五，同胥慶以慰望雲，益謹以錫類不匱之義，拜首為達壽祝！……緒山子相聚永和，稱太恭人之壽曰：「質庵方伯以風義節概俎豆鄉社，而幼服姆教，善承繼姑，是曰『能巽』；勵庵郡守續易庵參藩

⁴² 太恭人唐，張元沖（浮峰）之母，以勵庵郡侯考最封宜人，以子貴，推封太恭人。湛甘泉嘗壽太恭人曰：「上徵盡婦，中徵盡母，下徵盡妻；命曰三世之德，是為三不朽之道。」（見鄒守益：〈明故張母唐太恭人墓誌銘〉，《鄒守益集》，頁 1076）。

之緒，狷介峭特，以忤權貴，而服疏茹糲，蕭然宦邸逾二十年，是曰『能儉』；浮峰甫辟而孤，諸兄元楚、元傑未室也，而食貧力教，俾從名師勝友以弘世業，是曰『能訓』；迎養諫垣，時親箴紉，儉以養廉，稱述光範，喜慍不形，壯耄一致，是曰『能恒』。聚四懿以備群福，若鑾湖、耶溪之趨於海，無弗至矣。郊祀進階，移封以榮，則有若康靖；手詔存問，歎尚福壽，則有若文定；咸張氏舊族也。等而上之，飾戎車，奏膚公，以匡中興，尚有孝友家法在！」（鄒守益：〈達壽說〉，同前書，頁446）

11. 緒山兄至青原，即自仙壇赴之，而手疏先及，未得奉答，耿耿。向論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為準。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即所謂良知，即所謂至善。加焉則過，損焉則不及；不及與過雖異，其踰矩均也。……其曰無疑不惑，皆指良知至善精瑩鑒定而言，非就人上效驗說。故行有不得，反求諸矩。矩若加損一釐，便不免齟齬。切磋琢磨，步步有下手處。（鄒守益：〈與蘭以信〉，同前書，頁682）

12. 竹溪子以績最入考於京，會緒山錢子自韶東下。……緒山子會於永和，同志胥集，颺言於眾曰：「竹溪子之績，其信可考乎！天常樸茂，敦於倫理，於家庭藹如也。任司徒郎有聲，遜能而蒞劇郡，凡十邑之賦稅訟獄，昈列而櫛比之，是以胥吏不肆，而惄獨不擾。事上以慎，處僚以和，而利病聞於政者，介介不少貶。其於屬吏，戒貪殘而植其良，若在厥躬，上下胥孚，譽處日流，而其志欲然，有尚絅之操焉。」（鄒守益：〈贈竹溪林郡侯考績序〉，同前書，頁184）

13. 嘉靖庚子冬十月二十有一日，萬安方池周君卒於蘄之官舍，年六十有九。癸卯，仲子賢宣舉於鄉，歸省母氏劉。劉疾甚，以九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四。辛亥，宣偕兄寢、弟寰，卜葬於二十都菱陂之原。癸丑，宣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以修陵工加五品俸，考績，贈方池如其官，陞承德郎，而母氏贈大安人，徵銘於同志錢秋官德洪。錢子稱：「龍蛇深蟄，乃潛其神；巨鱗足涔，懷璞掩瑜。爰有令子，策駕遐蹤；振祥發端，褒崇幽泉。而天語下頒，有位不溢；才德能啟，後之褒矣！」（鄒守益：〈菱陂阡表〉，同前書，頁1105）

14.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王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

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腳跟轉。若執著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譏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著。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眾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受。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受。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仍當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洩。德洪卻須進此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脈始歸於一云。（王畿：〈天泉證道記〉，《王龍溪先生全集》〔清光緒七年刻本〕，卷1，頁1-2）

15. 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大倫）延留書院中。予（胡直）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祥，遽遠游，又乘青幃，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亡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痞悶，雖極尋繹，宿見意象俱似，而真體昏塞，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詳，迄不當予意。（《黃宗羲全集》，第7冊，頁605）

16. 緒山與之（貢安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

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即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同前書，頁673）

17. 緒山謂之（程大賓）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同前書，頁675）

18. 洪覺山〈錢緒山壽序〉：「吾之於學，常見其未盡處，不見有本體處。或曰：『不見則何知？』曰：『寧有未知，不可有所見。見於仁則住於仁；見於智則住於智；見於中正則住亦以中正。甚者，乃以虛見借藉成用，而不知其非有。故吾不敢有所見，見吾過而已。見吾過以求復，其知而已。』」（同前書，第8冊，頁221）

19. 昔緒山先師主新安盟，五邑人士雲集，獨華陽無一摠衣至者。師曰：「良知人人具足，特無呼而覺之者，安得華陽一人焉為嚆矢？」以不慧承之茲土六年，舉會幾遍。頃年華陽附歛以修會事，猶若逡逡不前。今且獨當一面，號召五邑人士至矣。（祝世祿：〈與華陽會會友〉，《環碧齋詩三卷、尺牘五卷》尺牘卷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4冊，頁213）

20. 吳悟齋中丞謂錢緒山曰：「頃貽書王龍溪，欲其實修實證，求之於言之外也。誠恐此老不察，又求之於言之內，不復向羞惡辭讓是非上用一鍼，即所謂惻隱者，未免認賊作子，將一傳而此學為世戒。」予讀而旨之，以為正與程伯子言仁之旨合。往嘗舉似同署麻明之。明之曰：「中丞能不認賊作子否？」予曰：「君以為何如？」明之笑而不答。（顧憲成：《小心齋劄記》〔臺北：廣文書局，1992年〕，卷1，頁34）

21. 古人以無欲言微。道心者，無欲之心也。研幾之功，只一無欲而真體自著，更不於念上作有無之見也（《黃宗羲全集》，第7冊，頁267）⁴³

除以上所錄外，尚能從〈緒山錢君行狀〉中輯出若干條緒山語錄，然因該篇已被全文收錄於吉田公平的《錢緒山遺文抄》，故不另輯。再有，據荒木見悟先生說，鄭維嶽的《四書知新日錄·中庸》中亦載有緒山語錄，然該書筆者未見，姑且存疑。

⁴³ 第19、20、21條，拙編《徐愛·錢德洪·董澐集》未收。

(二) 文錄

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

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能發聖人之蘊，夷考六籍，載孔門之言者莫詳於齊魯《論》，而孔顏授受微言不少槩見，又惡據以徵其善發耶？夫顏子雖終日如愚，退省足發，喟然之歎，千古聖道之微微焉，如見立卓，其在竭才之後乎？是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身也，言論非所與也。吾十七八歲時讀《傳習錄》，聞師門有橫山子者，今之顏子也。後十年侍師於越，橫山子已遺世五年矣。當是時，四方同志日進，吾師每歎曰：「孔門得一顏子而門人益親，吾於諸士安得起曰仁之遊乎？」而日聞吾師訓言，皆因人答問，然能根極理要者，或寡矣。有觸其機，如川流瀾湧，端緒略見，則又愀然作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不易及也。」同門退而竊歎者亦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侍幸聞之，年來不易及也。」噫，是橫山子之聞於吾師者，非聖道之微者耶！已而聞諸其家孺人王，少寡而無子，門內之政肅肅，門外之政雍雍。橫山厥考古真翁在堂，孺人躬具晨羞，寒暑靡變，曰：「此吾先子之遺戚也。」四方同志登其門者，御事惟恪，曰：「此吾先子之與遊也。」有遺言輯而成書，梓惠同志，曰：「此吾先子之遺志也。」孺人者，冢宰海日翁女、吾師之（案：原刻本作「止」）妹也。貴而不驕，富而有制，茹蔬服浣，人皆難之，則又曰：「此吾先子之遺矩也。」古真翁得少子采，孺人慈鞠若母，嚴迪若師，曰：「徐嗣庶其賴乎。」噫，是橫山子之徵於家者，非皆私省之實也耶！吾聞聖人之道無二，而中行獨難。高明之士，超悟頓覺，若可與言聖道之微矣，然其凌虛簡脫，徵諸彝理，往往疏略而不究。謹厚之士，刻意篤行，若可與履聖道之實，然了悟未真，□之漣化渣滓，盡透精要，則又見二而未融。斯二者皆非得於中行者也。橫山子遠矣！吾雖不及與遊，然其道至今未墜，想見其為人如和風煦日，冥悟道真，而又日見於行事，民彝物則闡如也。噫，身發吾師之蘊，如古之所謂中行，可與者非耶！信乎橫山子者，今之顏氏子也。孺人今年壽五十七，七月六日寔惟誕辰，采遺書曰：「先生知吾兄者也，采生也晚，大懼吾兄之澤日湮，敬徵一言以圖不朽，且將以為嫂氏壽。」予曰：「橫山之道刑諸家，孺人既足徵矣。然要諸久遠，信於後世，使必傳而無疑，非采其誰望耶？是在吾子。」（周汝登：〈徐曰仁語抄〉，《王門宗旨》卷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3冊，頁720-721）

三賢祠記

予讀晦菴〈方塘詩〉，乃歎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其所以承千聖之緒，下啟後學之端，盡見於是詩矣。特不知方塘在何地，後世亦有踵其芳躅而繼發其餘韻者乎？」今年五月，遂安庠生方應時、方世義等持其鄉達詹侍御理事狀，乞予作三賢祠記。予閱之，乃知方塘在遂安瀛山之麓，晦菴嘗自婺訪詹虛舟先生，往來論學於其上，名曰「瀛山書院」。迨歷宋元之間，歲久榛廢，晦菴遺教亦絕響矣。戊辰夏月，宛陵邑尹周子恪奉簡命蒞遂，訪求邑中舊事，得方塘遺址，心悅之，乃謀諸生方應時，創復書院而亭其塘。耆民方志達等又築祠於書院後，安朱子位於中堂，以崇祀事。謂三賢者，左列詹子儀之而虛其右，爰念周侯德教，將尸而祝之，以效畏壘之情。周子少事其兄太常君怡，奮然以聖學為己任，下車未及期，即政釐弊革，民懷其德，士趨其教。暇則與鄉達彥士論學於方塘之上，諸生躍躍然來歌來遊，追想關、閩、洙、泗之氣象，復見於今日，則周子倡學之功與朱子等，宜生祀之以衍其教於無窮也。夫朱子學有原本，達聖道之淵微，觀其方塘之詠，一鑒澄清，雲影天光，上下掩映，想見其胸中空洞，萬象森列，此即唐虞之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即孔門之鳶飛魚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即孟子之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即程子之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之意。噫，亦何自而得此哉？源頭活水，流而不息，言有本也。夫學莫貴於自得，渣滓渾化，全體不顯，斯逢源資深，道義之出無窮矣。今周子政根於學，學本於心，故臨政未久，而民知三代之政可徵，士信聖人之學可至，為有本也。今諸生服膺朱子教，則思其平生以必為聖人為志，而深造於聖學之淵微，爰率其身以達之政，斯無愧於是祠之築矣。余老矣，不能策杖與邑之諸鄉達彥士歌遊於勝地，因二生之請，姑序其說而歸之用，以寄吾之思云。隆慶庚午五月，緒山居士錢寬撰。（〈記〉，《四刻瀛山書院志》〔明萬曆間刊本〕，卷6）

瀛山三賢祠記⁴⁴

余讀晦菴朱先生〈方塘詩〉，乃歎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其所以承千聖

⁴⁴ 本文與前錄〈三賢祠記〉同。比較二文而知，《瀛山書院志》編者耿橘在收錄本文時，曾做過較大刪改，主要是把與王學有關的內容統統刪去，而保留了與朱學有關的內容。因二文差別較大，字數不等，故一併收錄，以備辨考。

之緒，下啟後學之端，盡見於是詩矣。」今年五月，遂安方應時、方世義等持其鄉達詹侍御理事狀，乞余作〈三賢祠記〉。余閱之，乃知方塘在遂安瀛山之麓，晦菴嘗自婺訪詹虛舟儀之，往來論學於斯，既後門人築書院於方塘之上，名曰「瀛山書院」，歲久榛廢，晦菴遺教亦絕響矣。邑尹周子恪來蒞遂，訪求方塘遺址，心悅之，乃謀於諸生，創復書院而亭其上，又築祠於書院後，安朱子位於中堂，以崇祀事。所謂三賢者，左列詹子儀之而虛其右，爰念周侯德教，將尸而祝之，以效畏壘之情。周子少事其兄太常君怡，繼從余與龍溪王子游，深信師門之學，奮然以聖學為己任，下車未及期，政釐弊革，民懷其德，士趨其教，暇則與鄉達彥士論學於方塘之上，關、閩、洙、泗之氣象，復見於今日，則周子倡學之功與朱子等，生祀之以衍其教於無窮宜已。余少業舉子，從事晦菴《集注》、《或問》諸說，繼見吾師陽明夫子，省然有得於良知，追尋朱子悔悟之言，始信朱子學有原本，達聖道之淵微矣。故嘗增刻《朱子晚年定論》，使晦菴之學大顯於天下。觀其方塘之詠，一鑒澄清，雲影天光，上下掩映，想見其胸中空洞，萬象森列。噫，亦何自而得此哉？源頭活水，流而不息，言有本也。夫學莫貴於自得，斯逢源資深，道義之出無窮。今周子政根於學，學本於心，故臨政未久而民知德。諸生服膺朱子，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說，而復因周子之政，以追原王門之學，自率其身以達之政⁴⁵，斯無愧於是祠之築矣，余老矣，不能策杖與邑之鄉達彥士歌遊於勝地，因二生之請，姑敘其說而歸之周，以寄吾之思云。（〈藝文〉，《嚴州府志》〔清光緒九年增修重刊本〕，卷31）

修復慈湖書院記

先生祠祀之在慈者，考諸邑乘，其來舊矣。沒之日，門人建祠慈湖之南，率鄉人為私祀者凡六姓。至咸淳間，制置使劉文忠公黼始奏改為書院，置山長學員，以典祠教人。元提刑侍郎君佐，復擇地改建如宋制，今湖北遺址是也。明興，議革天下山長，歸學徒於縣學，而先生之祠祀遂廢。嘉靖乙巳，泰和劉子逢愷以進士尹慈，首倡道教，風勵士庶，睹祠之廢，慨然興咨，乃上議於知府魏子良貴，葺修祠像。祠後為燕堂，堂後為橫經閣，前為扉軒，左右為齋舍，凡若干楹，樸斫藻繪，

⁴⁵ 《遂安縣志》（卷10，民國十九年刻本）所載此文自該句後有異，見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794。

煥然一新。乃更請於學使孔君天引、監察御史楊君九澤，始克復其祀事，而六姓之後若劉侍御安者，復相與聯其鄉之縉紳，贊其尸祀，以修歲臘享會之禮，而後生學士翕然思服先生遺教，皆來駿奔，於是弘規茂制，燦然大備於舊矣。劉子爰與邑之大夫士聚講於斯，復命先生裔孫淡請德洪記其事。德洪嘗伏讀先生遺書，乃竊歎先生之學直超上悟者乎。其始未悟也，求心之體不得，聞象山舉扇訟，豁然有覺，曰：「此心之體，至止靜而至變化，至明達而至自然。故循其自然，視自能明，聽自能聰，言自能義，動自能和，事親自能孝，事君自能忠，不識不知，而帝則自察者，心之體也。」惟起乎意，便涉安排。故視橫意則昏，聽橫意則塞，言橫意則殆，動橫意則乖，將迎固必，私智紛錯，而帝則日漓者，失其體也。故先生教人嘗曰「不起意」，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心之精神凝聚則明，而分散則昏病起意也。先生賦質英粹，其平生不濡世紛，不染習陋，故一觸其機，能洞徹心源如此。但其教人，已如此入，亦即如此示人。蓋直指本心而欲超頓以入。根性利者，則能覲體承接，若江河之沛決；其次資悟不齊，則階級懸隔矣。聞其說而不入，往往疑其或近於禪。夫禪之說與先生之書具在，其私己同物之心，區然辨也。乃惟聖門詳於下學而不竟其說，就人所至以俟其自化，故人人樂得所趨。而先生愛人過切，立言過盡，容或有之。然謂其學非性情而疑訾之，則吾性昭然，斷斷乎不可誣也。德洪方有感於先生之學，深慶諸君子今日之舉，誠有徵於心之同然者，乃敢僭敘其事，而因及其學，使後之主祀於茲土者，庶亦知所從事云。（原載《慈溪縣志》〔清雍正八年刊本〕，卷4；現據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547-548）⁴⁶

二賢書院記

二賢者，宋鄱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翁，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鄱陽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齋；珙字仲璧，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淳熙間，偽學釁萌，朝臣目瑞士為邪氣，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國。端蒙既薦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王、蘇、程之學策士，以陰詆晦翁，諸生駭愕閣筆。端蒙獨奮策正言，謂：「紹孔、孟之傳，闢異

⁴⁶ 該記文《四明叢書》第四集《慈湖遺書·新增附錄》有節錄，文末附有編者張壽鏞按語：「嘉靖乙巳，知縣劉逢愷修祠，請復春秋二祀，載在祀典，以至於今。錢德洪為之記。」

端，息邪說，以宏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立朝，節氣可觀，特學術未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遺智。」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尚可與共事者哉？」遂投策而歸，不復出，與其友董銖、王過，聯師樹聲，倡率同志，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菴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公慟其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為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訓〉、〈學則〉等篇校閱之，且親為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啟來學而振末俗也。紹熙五年，朱子赴召，再過玉山，邑令司馬邁設師席於學官，時珙率諸生羅集壇下，質疑義，辨異同。文公為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鵝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疏》行世。寶祐以來，副使王佖、原任知縣俞玘、許公高相繼立祠，以崇毅祀，曰「蒙齋書院」，曰「柳湖書院」，提學副使王宗沐亦各為題其碑額。今年裔孫生員一麟、一龍、尚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菴之學，歸以尋繹其祖訓，瞭如也。乃率其宗黨生員德美等，謀議邦人之良，合二祠而為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敘睦族之義焉。（〈學校志・書院〉，《饒州府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卷7）

明故先妻敏惠諸孺人墓誌銘

嘉靖甲子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我妻敏惠孺人及長子應度、次子婦王氏，墓在勝歸山之玉屏峰下人字岡，表忠世廟後壟也⁴⁷。嗚呼！敏惠之沒，哭冢子也，而不知身沒之後□子婦同窆也。應度沒後喪其長女，王氏沒後喪其季子，五年之內五喪相仍，誰茲卜兆，三喪並舉且同穴也。使我以座老之年臨之，將何以為情耶？造化茫茫，無心相值；入我以無何有之鄉，示我以未始有生之始；其死若夢，其生若覺；覺夢代禪，晝夜相錯；誰毀而成，孰悲而樂；惟吾良知，超生出死；為萬物紀，歷千載而無今昨。吾又烏能以爾動吾之衷，齷齪索索，為皆為嗜也乎哉！敏惠姓諸氏，生於開元鄉之舊族。其才且賢，嘗為狀其略矣。應度幼篤聞道，早輔吾學，同遊日親，臨沒有悟，貴志而往。子曰人元，為吾父心漁公嫡曾孫也。王氏吾次子應樂妻，錦衣紫溪先生王正憲女，吾師陽明夫子長孫女也。能承家學，執婦道，生子

⁴⁷ 案：光緒《餘姚縣志》缺「山之玉」三字，現據乾隆《紹興府志》補錄。另「表忠世廟」，乾隆《紹興府志》作「表忠祠」。

人宗、人會。繼娶趙氏，生子人官、人英。葬敏惠虛其左壙，以須吾息。應度左附虛左壙，從其妻蔡氏請也。銘曰：敏惠之沒，身殉子死；一日三窆，我心曷已？造化無心，孰興孰圯？視爾無生，我生亦寄。爾寧其歸，我慎生理。爾窆我銘，我作爾止。順天之休，與道終始。子孫仍仍，庶延爾遐祉。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吉旦，孝男錢應樂、孫人元立。（〈金石〉下，《餘姚縣志》〔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卷16，頁26）

魯氏重修世譜序

古者統一人心，各有所分守，天子分守以四海，諸侯分守以封內，卿大夫以祿，士庶以田，故各得所依，以相奔世，綱紀立而治法彰，親疏辨而民族睦，治得其道也。後世上不揆道，下無法守，封建廢而國無世土矣、仕無世祿矣，井田廢而民無世田矣，世土祿田廢而天下無世族矣。秦漢而降，二三大家所以衍奕葉之緒於不替者，惟世譜一事而已。夫世譜之傳，亦非空文之足恃，必先祖有王公之貴、賢聖之尊，或卿佐之顯，斯道德功業表著於當時，流光於後世。苟無其人，則澤易斬而子孫微矣，故譜之遺，必先祖得人而後可傳也。先祖有人矣，使繼體不續，則文獻無徵，亦不足以稽前而啟後，故世譜之遺，必子孫得人而後可承也。子孫得人矣，然所居或都會之衝、戰爭之地，又不免播遷焚擄之慘，故世譜之遺，必居得其地而後可久也。吾姚稱世族之盛，蓋自扈宋南遷，定居者多王公賢聖之後，且山水完會，世出聞人，雖鄰島夷，然城邑之固，山澤之邃，民亦足以自守。三者備，而譜牒之傳獨盛於天下。景橋魯氏者，周公之苗裔也。其先有諱居仁者，為宋翰林承旨，世汴州京。六世而曰雲、曰雷，以部郎諫議，扈宋遷居秀州。雲之六世曰鑑者，又由會稽卜地於姚而居焉。景橋去邑北十里，平郊衍陌，四山環翠，其族繁庶，五六里無雜姓。鑑之子曰允實、允直，助築邑城，而世已顯著。八世而養素君，曰懷恒者，尚德好義，試計然之策，累貲具，表先塋，賑貧乏；慮宗黨之盛，易侈而肆也，乃聯約束，以鎮雅靜，而族之齷訟好鬭之風消。其子西北君，曰廷楷者，又從而敷大之，開菊圃以延賢士大夫，立族約以屬賢子弟，而族之衣冠進退之風起矣。且置贍田，以崇先祖祀；續世譜而梓之，以惠布諸族。譜成，乞予序譜首。予維世族之在古今，猶河漢之光天，川瀆之麗地，精華血脈，經絡緯劃，千載如一日，雖其中不無絕續疑信，然據後世子孫繁著，則自委以溯源，其來能無自而然耶？魯氏自承旨而上，雖未能盡據，然其子孫更世已二十有五矣。據後而觀，信

其為王公賢聖之後無疑也，況世顯卿佐文獻之足徵乎？西北君表揚先烈，而又以義率人，世譜之刻，寓意深遠，非徒文獻足徵於時；布列之廣，家藏一帙，有金匱石室固焉，是非繼體得人，光裕前後，其能若是乎？後世子孫讀是譜者，其將侈先祖之美，以自高其門第乎？抑思先祖之美，而求以繼其志也？吾錢氏祖姑，與魯三世締姻，子孫出自錢氏者三居其一焉。予讀是譜，其情非漫然者，故樂為之序，且以為魯氏子孫勗云。時嘉靖戊午正月望日，賜進士第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緒山居士錢德洪甫撰。（《姚江景嘉橋魯氏宗譜》〔清光緒二十二年孝思堂刻本〕，卷首⁴⁸）

奠王良文⁴⁹

良知之明，萬古一日。濂洛既遠，此意幾熄。惟我陽明，獨指其的。吾黨信疑，或未協一。惟我心齋，克踐其跡。志果而確，功專而密。求志安豐，匪徒隱逸。勉仁樂道，惄惄切切。卓爾心齋，海濱豪傑。同志依歸，斯文羽翼。嗚呼已矣，無窮之戚。天喪斯文，哲人斂跡。臨風一奠，寫此衷臆。（王良：《譜餘》，《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民國六年袁承業排印本〕，卷4，頁15）

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序

古者豪傑之興志，存乎為民，其必有倉卒制變之才，因時達權之智，終始一心之忠，夫然後足與銷禍亂，續民命，以綱紀四方也。唐丁未造，群盜蜂起，黃巢擁眾二十萬，所過州郡□剪焚蕩，民無孑遺。當是時，吾祖武肅王，決策鄉里子弟數十騎禦之，賊遂宵遁，兩浙賴以保全，其倉卒制變，可謂神矣。既而僖昭蒙塵，中國無主，□削平草竊，慎固封守，以俟天命。迨及宋興，遂率其土地人民，以歸正統。父子若孫，三世一心，可謂忠矣。作史者列《十國世家》，乃等吳越于竊據之例，不已過乎？夫謂之「竊據」云者，私其土地人民而有之也。當時吳、閩、蜀、漢乘時僭號，力抗王師，使民積骸灑血，力窮國滅，若是而謂之竊據可也。吳越之肇基也，皆取之群盜之手；其受封也，皆出自朝廷之命。五季無可托國，及有宋受

⁴⁸ 該譜卷首尚載有王華撰於弘治七年的譜序一篇、像贊一則，卷三載有王陽明撰於嘉靖六年的〈廷璽公像贊〉一則，故知餘姚王氏、錢氏家族與魯氏家族的關係均甚為密切。

⁴⁹ 此奠文由錢德洪與戚賢、劉魁、孫應魁（奎）等十四人合撰，儘管非錢氏一人所撰，但亦代表了緒山的心願，故亦可算作緒山之作。

命，遂先納歟。歐陽文忠謂其知尊中國、效臣順矣，而又等之竊據可乎？讀史者不明大端，顧曰錢氏嘗違昭宗赦董昌矣，嘗自改元於國中矣。夫當時昭宗播遷，政柄下移，民失所恃，王惟以保全生民為重也。昌之僭亂，不赦之罪也。楊行密為之奏，自為己地也。改元之說，無有的據；且當朱梁後唐革命之晨，中國未有共主之日也。夫苟以民命為重也，則雖不從亂命，拓封疆以自固可也。曆數未有所屬，雖自紀年亦可也。是皆識時達權，真正大英雄所為，豈規規小信足與擬乎哉？夫古今有不易之理，人心公論是也。吳越之民，自唐以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愛戴錢氏之心，有如一日，是非有刑驅勢迫之也。其遺澤在人，故沒世而民不能忘也。作史者至謂其剝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當時天下遭黃巢、契丹之亂，人至相食，有呼宰人所曰「春磨寨」、曰「宰殺務」者，慘毒不可言矣。歐陽子作〈有美堂記〉，特稱錢塘之民，獨得富完安樂，邑屋華麗，十萬餘家，斯實錄也。司馬溫公《通鑑》，大書錢氏蠲租赦荒，不一而足。趙靖獻公奏修錢氏墳廟，謂父老過之而流涕者。王荊公讀東坡〈表忠觀碑〉，謂其筆直事核。一時論定，罔有異言。厥後朱文公特書於《綱目》，胡致堂論辯於《管見》，豈非人心公論，有終不容泯滅者乎？若文忠者，固一代良史也，而為說獨自相牴牾如此，則史之闕文傳疑，豈《春秋》之後可易得哉？昔者蘇子容為父辯謗，欲奏改革頭木腳之語。洪念先德不白，往來於懷，然而歷考諸先正，則有若不待奏改而大義固已暴乎天下後世矣。用是授簡于門人馬蠶臣，為集諸家語，在吳越者彙次之，為《吳越世家疑辯》，使讀史者得據為案，以訂史文之疑，非敢為一家之書也。時大明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春三月朔日，賜同進士出身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前國子監監丞詔冠帶閑住吳越國武肅王第十九世孫德洪頓首百拜撰。（馬蠶臣：《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明嘉靖三十九年錢德洪刻本〕，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63冊，頁311-312）

彭祖庵碑記

世傳彭祖即老子，其本傳所謂古先生者是也。予甚疑之，盍亦論其世乎。〈世紀〉載彭祖姓篯名铿，歷仕夏、商、周，為國師。在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九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孚，為周文王之師，去竹氏錢，為吾錢氏受姓之始。後世道家者流，見彭祖永年，乃援入《神仙通鑑》及《道經·夷武志》諸書，皆附會命術之說，鄙誕不經。武肅王作《大宗譜》，止錄〈世紀〉，所載不增一字。至十世魏國公作《慶系譜》，即增其導引術，得道往流沙語。蓋徇道流之

說，而信其為神仙祖師也。予謂祖為三代國師，則三代之教，聖人之學也，三代有道之長，後世莫尚焉。周文王大聖人也，而師孚公，則父予以聖學相授受，較然明矣。稽其世，孚公之後，在漢為讓公，以忠諫武功封富春侯。在唐為武肅，以至忠懿，皆保民衛國，忠順繼世，不失聖學之家風。若老子所傳曰莊、列，曰赤松，曰伯陽、平叔，皆自師其學，與聖道區然別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謂彭祖之所學，即二帝三王之道，而吾之所傳，即彭祖之所述，不敢有所作也。若老子背六經以言道德，則作而不述矣。孰謂彭祖而可以老子擬乎哉？夫彭祖為聖人之學，亦得以延壽八百，則太上所紀壽數與堯年舜壽，俱可證也，又安得聖學之不為人仙耶？特為聖學者，未用其極耳。聖人之學，順性命之理，性與天地萬物同體，故亦以天地萬物進退盈縮為命，是所為大道也。在身為修己，在家國天下為治人。堯舜三王之治，其效至於鳥獸草木，咸若其性，而況於吾之一身，神與氣精有不得其理者乎！後世聖學不明，世趨俗染，紛囂馳逐，愛河欲海，枯髓竭精，日求死路而趨之。故清修高明之士悲之，出為修生之術以救世，其所謂觀妙窺以歸元冥，收攝保持以和神氣，亦于道奚甚遠者？即彭祖處世久持，亦豈無術以制其身哉？特其道不出人倫庶物，但見其述而不見其作為後聖法。今之修生者，一以生死繫念，輒欲遺世絕物，以遂其自利之私心，毫釐千里，有不容于不辨耳。故敢述孔子之言，以證聖人之學不同於老子；據彭祖之壽，以證聖人之學未始或遺乎仙術；則庶乎學聖人者志專歸同，天下之學出於一，經正而民行興、邪慝息矣。庵在錢塘西湖之濱，先王表忠觀左方。通政東匯呂公、太僕玉陽史公，相與度材圭位，擇報先寺僧性天首其事。殿堂齋室，凡若干楹，匾曰「壽域重開」。又擇其弟性旋為開山主。又治東堂，以奉其師碧峰慧忠。蓋三子墨名皆能道。修生之術將逃于楊而歸於儒，吾深有取焉。乃為申明彭祖之學，以紀其成。（錢文選編：《錢氏家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卷8，頁194-195）

合葬墓圖記

先六世祖宋駙馬都尉會稽郡王暨賢穆大長公主合葬之墓，在天臺縣西北三十里，護國寺東五百步，鳳凰山之陽。謹按：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於汴京賜第，年七十二。未幾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即位于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長子榮國公忱等，奉母賢穆與郡王靈輶奔江南，權厝於丹徒縣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即奉母避浙東，旋遷台州。高宗既定鼎杭州，即台城賜公主營第。紹興二十年冬，

皇太后鑾輿北歸，賢穆歡乎大喜，乃求入觀。或謂主年高，恐攬寒暑。主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獲春秋時見。今國有大慶，可即安不一賀天子乎！」既至臨安，見上並見太后，相為涕泣。上與太后遣使勞問，相望於道。居數日，主寢疾，上趣國醫診視，疾少間。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湯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遷郡王靈輶，與賢穆合葬焉。（同前書，頁195）

悠遠堂記

予嘗求夫悠遠之義大矣哉！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運行，與夫人之所充積涵養，建業立功，著於當時，傳於後世無窮者，莫不有悠遠之道焉。吾六世祖始家白兔塘，號曰南山祖，宋淳祐八年卜築白雲山下七宅，以至於今，四百餘年，堂屋二十一間獨存，世守弗替，是非積累之厚，繼述之美，曷克致此？余乃名曰「悠遠堂」，蓋以表其先世之德，使後之子孫景仰而興起焉。今六世孫諱元傑，號雲山，兄者居之，作文以記之。夫悠遠即悠久之義，悠久者，天地之道所以成物者也。故人生天地間，亦莫不有悠遠之理。養生以寡欲，居易以俟命，此一身之悠久也。積善基於前，樹德承於後，此一家之悠久也。自我先王以忠孝之胄，衍慶垂裕於其子孫者，固為深厚，宜乎後人之益蕃且盛，而不至於失墜其先業，此豈非深知夫悠久之理，而能得夫悠久之道者乎！名堂之義，蓋不外是矣。世固有閥閱第望，赫然而興，震耀當時，自常情觀之，蓋以非尋常所及，然不數世而曾不一傳，則泯焉寂焉，無復有聞於世矣。如此者，其無悠久之德也。為先王之子孫若雲山者，可謂賢矣。紹先業以光其後，斯堂之存，非雲山修緝防範之功，焉能有今日之存也。每於墓祭之時，一登斯堂，揭雲山之翠，酌白兔之泉，與雲山敘悠久之說，慕祖敬宗之意，藹然而生。親親之義益篤，豈不樂哉，故為之記。（同前書，頁196）⁵⁰

仰止祠記⁵¹

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為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

⁵⁰ 以上三篇文錄及詩錄中的最後二首，拙編《徐愛·錢德洪·董澐集》未收。

⁵¹ 此文《陽明年譜》擇要而錄。「二三子」前是「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略曰」（見《王陽明全集》，頁1349）幾個字。因原文已逸，現據《陽明年譜》移錄。仰止祠在蘄州麒麟山之崇正

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疏，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為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為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登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睹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為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於陷阱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於無窮，斯為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年譜附錄一〉，《王陽明全集》，卷 36，頁 1349）

惜陰會語

錢緒山德洪曰：「戊申與龍溪赴青原復古會，今九年而再至，窮鄉邃谷，田夫野老，皆知有會，莫不敬業而安之，是豈笑貌聲音之足徵乎哉？蓋吾師以人人同得之心啟於前，諸先達以人人同得之心發於後，道有本，教有端，入而得，行而成，諸子弟夙膺父師之教，亦嘗究及卓立乎！學不及微，非入也；遇物而反，非得也；人我未同，非行也；無傳於後世，非成也。不究其初，無以見斯道之明；不要其終，無以考斯學之相。引於無窮，此先達所為諄諄也。」（釋笑峰等撰、施閏章補輯：《青原志略》〔清康熙八年刻本〕，卷 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5 冊，頁 561）

陽明先生詩錄序

右錄以履歷為次者，蓋以見吾夫子情隨所遇，辭以時發也。以滁陽後為正，而

書院內，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錢德洪應沈寵之請而撰此文。此外，錢德洪在嘉靖年間還受青田混元書院范引年之託，撰有〈仰止祠碑記〉（《王陽明全集》，頁 1335）一文。換言之，錢德洪曾分別為蘄州崇正書院和青田混元書院寫過兩篇〈仰止祠記〉，內容是否相同，不得而知。

前附之，見吾夫子所學益精，辭益粹，誠之不可掩也。讀是錄者，以意逆志，而有會焉而興焉，而求其所以精，得其所以粹，無以其辭焉而已矣。則是錄之傳，庶其不繆矣乎？嘉靖庚寅五月望日，門人錢寬謹識於錢塘勝果寺之中峰閣。（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陽明先生詩錄》卷首⁵²）

王陽明先生像贊

思自孩童，即聞至教。言詞動履，並皆心妙。學問由成，中和體效。功業所就，仁義肯要。千聖一心，良知孔竅。俯仰古今，至誠合道。（《王文成公全書》〔明隆慶六年謝廷傑刻本〕，卷首）

涇縣儒學明塘碑記

學塘者，涇縣儒學之泮壁也。其為廣也，幾百幾丈；其為畝也，二十三有奇。學對承流山，其狀元峰，與蓮花、望雲諸峰相聯，如翠幙之外，秉圭端立，下與塘光相掩映。脈則從天馬降勢，中支則入為縣治，右支循溪而北，逆跳與縣址相構，而塘於縣為後襟，於學為前襟。於通邑論之，如人身為氣海，毓育元和，疏洩穢惡，蜿蜒左出，與涇溪會流，則是塘雖於學為鐘秀之地，寔一邑風氣所關也。舊半屬民，有司每圖復，未獲。歲嘉靖癸丑正月，郡守劉公起宗，奉部檄丈六邑之田，以平民賦。涇令邱君時庸適當觀行，難其人，應山黃公鉦以部曹謫貳郡事，公喜曰：「涇民得所矣。」遂請諸督學方泉趙公，來治篆，鳩譟訪士，定智畫方，推誠布惠，彌月而功告成。既謁文廟，士進議，公曰：「吾將圖之，償以直。」沈麟氏者，且庠士也，願為輸稅而辭其直。公義之，為之立券，塘則盡屬於學，水則量給沈氏濟荒，以勵尚義之風。公將離政，學諭程君學顏、訓導黎君文啟，率諸生張問政、王文炳，請予紀其事，而久未有以應也。適今學諭鄭君燁，偕學訓劉君諫，端軌立範，式興文教，如修飭廟廡齋舍，題名立碑，屏牆創制，凡有裨於學政者，加意修舉，復申請學塘之文。予惟古之名士，身游一方，則一方之民必假物以識其思，如吳之范蠡、李太白之郎官湖，與涇之秋霜閣、桃花潭諸勝，不必其德澤功業加諸民，雖一時流寓宴適，民必相傳為勝事，是豈徒侈一時之好哉？尚其人也。吾

⁵² 釋文見水野實、永富青地：〈九大本《陽明先生詩錄》小考〉，《汲古》（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第35號，頁37-43。

聞黃公之立朝也，秉躬抗志，其為政也，潔身惠民，特嚴厯峻節，往往不與時宜，其人品之高，使其流寓於涇，尚當與太白諸賢遺後人之思，況其一月報政，不動聲色，而遂為涇民定百世之業，則民之思其遺德也，又能以自己乎？故塘之記，匪徒存一時之廢舉，而士民之心，當必有所寓焉爾。況鄭公縣宰，方創建水西精舍，與學師率諸生講明性命之學，而保甲之法，與鄉之父老鼓禮讓之風。其立政也，則先養而後教，教則先士俗而及民俗，施為次第，燦然具舉。而君之履訛以成賦，廣學以興士，適與之後先相應，則民之致其思也，其又能已於世世乎？君已行矣，而師生之請遑遑不怠，是雖公實德所召，而亦以見涇風俗之厚，不以公去留而為阻勸也。又鄭君之修舉學政，昭然可觀，皆不可以不書，乃遂為記。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秋八月望日之吉，賜進士第承德郎刑部員外郎餘姚錢德洪撰文，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前兩京戶部郎中行人司司正邑人王廷幹書丹。（〈學校〉，《涇縣志》〔清嘉慶十一年刻本〕，卷7）

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

嘉靖戊午冬，懷玉書院工告成。廣信知府鑒塘周君倅建議飭工延師，瞻土百慮，周集故土，樂有寧宇，以安其學。既將入觀，以其事屬其僚黃君紋。已而考績以最聞，擢雲南按察副使。鑒塘寓書黃君曰：「吾將遠別，不得視諸生成，所貽俸餘若干，為我置書於局，使院生日親先哲，猶吾教也。」時中庵讀《朱子晚年定論》有感，謀諸斤石呂子曰：「書院復朱子草堂之舊，書生登朱子堂，瞻朱子稟餼，進之以朱子之學，可乎？」夫諸生所誦讀朱子者，中年未定之說也，而不知其晚年之悟之精且徹也。予昔聞知行之說，自謂入道次第，進無疑矣。今讀《定論》，寧知致知者，致吾心本然之知。其與守書冊、泥言語、討論制度、較計權術，意趣工夫迥然不同也。昔聞存省之說，自謂動靜交修，功無間矣。今讀《定論》，寧知本然之知，隨觸發，無少停息，即寂之中感在寂，即感之中寂在感耶。夫學莫先於識性之真，而功莫切於順性之動。知不求於口耳影響，而求諸吾心之本然，是得性之真矣。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譬之四時，日月流而不息，不見造化聲臭之形，是顯微無間，順性之動而無違也。斯朱子定論發吾道之微，幾揭造聖之規範也。以是而進諸生，亦足以慰鑒塘之教乎！斤石子曰：富哉！善推鑒塘公之心也。朱子晚年病目靜坐，洞悟性真，昔其門人無有受其意而昌其說者。今得陽明先生，而朱子之學復顯明於天下。以是而授諸生，則鑒塘之心匪徒足以淑院生，將達

之天下後世無窮矣，不亦善乎！於是黃君命上饒丞章子經，糾工鋟梓，置板院局，以惠諸士，乞洪書其事。洪嘗增刻《定論》於南畿，因茲請，乃復為引其端云。嘉靖己未夏仲端陽日，後學餘姚錢德洪書。（《朱子晚年定論》〔明嘉靖三十八年懷玉書院周倅重刻本〕，卷首）

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

適道者如京師然。所入之路雖不能無遲速之殊，然能終期於必到者，定志於先也。苟無定志，中道氣衰，怠且止矣，烏能望其必至耶？洪業舉子時，從事晦翁先生之學，自謂入聖塗徹，必在是矣。及叩師門，恍若有悟，始知聖人之道，坦夷直截，人人易由。乃疑朱子之說契悟未盡，輒生忽易之心焉。二十餘年，歲月既去，毛髮更矣，而故吾如昨，始歎然知懼。遭歷罪獄，動忍憂惕，始於師門指受，日見親切。復取晦翁之書讀之，乃知其平時所入不無意見之偏，但其心以必造聖人為志，雖千迴百折，不敢怠止。稽其實，其立朝也，以開悟君心為切；其蒞政也，以民受實惠為功；其接引後學也，惟恐不得同躋聖域為懼。及其晚年病目，靜坐有得，則盡悔平時注述，誤已誤人，與其門人，務求勇革，勿避譏笑，且使遍告同志，其胸中磊瑩，真如日月之麗天，其過其更，人人得而仰觀。噫，若是而可以忽易觀之哉！宜其推重於當時，傳信於後世。是信之者，非徒信其言也，信其人之有徵也。但世之信先生者，皆有求為聖人之志矣乎？其格物窮理之說，似有近吾詞章記誦之習，而注疏章句之便，又足以安其進取利祿之心。遂執其中年未定之說，號於人曰：吾能忠於朱門也云云。若是而欲立朱子之門牆，麾斥且不暇矣，而況欲為其效忠耶？苟有出是者，亦不過執其持敬力行之說，以為矜名競節之規，亦未聞有終疑其所入而得其悔者，是亦未有必為聖人之志，安於一善止也，又烏足以為深信朱子耶？《朱子晚年定論》，吾師嘗有手錄，傳刻於世久矣。史生致詹讀之，若有契焉，欲翻刻以廣惠同學。洪為增刻，得二卷焉。蓋吾師取其晚年之悔，以自徵其學不畔於朱說。洪則取其悟後之言，徵朱子之學不畔於聖人也。使吾黨之疑朱子者，勿以意見所得，輒懷忽易之心；信朱子者，毋安於其所悔，以必求其所情，庶不畔於聖人，是謂真信朱子也已。嘉靖壬子夏五月。後學餘姚錢德洪撰。（同前書）⁵³

⁵³ 後兩篇拙編《徐愛·錢德洪·董澐集》未收，現據永富青地〈錢德洪〈朱子晚年定論〉について〉（《人文社會研究》，第47號，2007年）補入。

(三) 詩錄

水西用李太白韻

天宮集良朋，相攜出江郭。朝宿風光臺，暮躡秋霜閣。
青崖日盤回，白雲互漂泊。俯淪清泉流，坐看飛花落。
嗒然忘去路，遺世若殞繯。誰當念道謀，千載同述作。
便須共支茅，凌風振寥廓。人生會有期，百年定心諾。

寄示水西諸生

自別天宮海上來，思君此日講筵開。幾宵晤語風前榻，一曲清歌月下臺。
眼底流光真過隙，人間世味卻殘杯。岩頭坐久忽忘去，遙見溪雲天際回。

壘玉墩

仙人閑歲月，壘玉砌成墩。我亦千年客，溪聲月下聞。

九里潭

潭上飛霞入錦屏，潭中流水寂無聲。若把人心擬潭水，寧知靜處即流行。（〈詞賦〉，《涇縣志》，卷 31）

外詩扇二柄寄念菴⁵⁴

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跡間。
今日下翁榻，相對無怍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閑。
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
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
遠求憂得門，況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俯惟創業艱。（〈年譜附錄二・答論年譜書一〉，《王陽明全集》，卷 37，頁 1370）

天真精舍詩

雲埋五嶺路悠悠，海上蘿浮入夢愁。山月淒涼歸鶴夜，霜風颯瑟淚猿秋。
百年著述圖書在，千載經綸草跡留。忍伐祠前蒼峽樹，春秋配食薦晨羞。（原載萬曆《仁和志》，現據王同編：《杭州三書院紀略》移錄，見《中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9 冊，頁 112）

⁵⁴ 詩名係筆者據〈答論年譜書〉所記內容而加。

上懷玉

地絕人去未覺暇，歸途回首隔煙霞。七盤雲磴凌天寨，九疊溪聲落少華。

翠谷有田堪種玉，深林無路自成家。遊人到此俱仙侶，何必天臺學飯麻。

過草堂遺址

萬峰環玉草堂虛，先喆當年遺故墟。月落前山疑生嘯，雲吹飛瀑見飄裾。

傳經有志期明道，病目無言廢著書。我已衰年悲舊學，肯將勝地競三餘。（夏浚：〈易簡堂記〉，《月川類草》卷6，《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07冊，頁89）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所輯錄的大多數緒山佚文，其實皆非《緒山會語》之原文，故亦談不上《緒山會語》之輯逸。因為王陽明一直反對撰寫「應酬諸作」，所以緒山在編纂陽明著作時便將此類文字做了大量刪節，而且其本人也很少撰寫此類文字（比如明焦竑《國朝獻征錄》錄有羅洪先寫的傳記、墓誌銘多達二十七篇，王時槐寫的有十六篇，鄒守益、陳九川、張元忭、季本、黃綰、聶豹、胡直、陶望齡等陽明學者的也有收錄，而惟獨沒有緒山和龍溪的。這固然與他倆在官場上的時間不長，無緣撰寫這類本屬顯官名流的「應酬諸作」有關，但我認為主要還是受陽明的影響使然），更不會同意把此類文字收錄於《緒山會語》中。

除以上所錄內容外，在查閱各類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獲得了一些有關緒山佚文的有價值的線索。比如由《四庫全書總目》「始知明嘉靖間錢德洪所撰《吳越世家疑辯》……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工也」⁵⁵；由《明儒學案》而知緒山有〈徐橫山傳〉、〈汝源紀聞錄〉、〈與貢受軒書〉和〈和羅整菴贈劉公詩韻〉⁵⁶；由《姚江書院志略》卷下〈附議〉⁵⁷而知其有〈正學淵源錄〉和〈半野蓬記〉；由王畿的〈與羅念菴〉、〈緒山錢君行狀〉而知其有與王龍溪書⁵⁸，以及〈困學

⁵⁵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頁1469。

⁵⁶ 分見《黃宗羲全集》，第7冊，頁194、248、342、673。案：據《明儒學案》卷九〈忠介楊鈞山先生爵〉載：「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晴川）辭行，整菴贈之以詩。既劉公下獄，與予（楊爵）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黃宗羲全集》，第7冊，頁193-194）故以〈和羅整菴贈劉公詩韻〉稱之。

⁵⁷ 〈附議〉由黃宗羲所撰，見《中國歷代書院志》，第9冊，頁290。

⁵⁸ 如據王畿〈與羅念菴〉：「得緒山兄書，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次序。」《王龍溪先生全集》，卷10，頁19。可知緒山為編纂修訂《陽明年譜》而曾寄書王龍溪，可能還不止一通。然不知何故，這些書信皆不見於《王龍溪先生全集》。

錄》、〈頤閑疏〉、〈團練鄉兵議〉、〈吳越世家〉及「藏而未行」的《言行逸稿》一編；由呂本的〈緒山錢公墓誌銘〉而知其有《婦行錄》一卷；由羅洪先的〈論年譜書〉和〈與錢緒山〉而知其有〈論夜坐詩〉及使念菴「受益不少」的〈凝德樓會語〉⁵⁹；由萬表的〈讀錢緒山敘思樂書〉而知其有〈敘思樂〉⁶⁰；由吳時來的《證道編》而知其有〈與吳悟齋書〉（見上述）；由鄒守益的〈菱陂阡表〉而知其有〈劉大安人墓銘〉⁶¹；由緒山本人的〈答論年譜書〉而知其與龍溪曾在「念菴之學偏於枯稿」的討論中有過書信往復，由《陽明年譜》而知其曾為范引年所建的混元書院寫過〈仰止祠碑記〉，並為萬安同志籌建的雲興書院「作疏糾材」⁶²；由《寧國府志》而知其有〈九龍會族序〉⁶³；由《涇縣志》而知其有〈水西書院志〉⁶⁴；由鄒守益的〈緒山書院教語〉而知該書院由緒山弟子王守勝、程良臣建，而緒山曾為該書院撰寫過〈緒山講院訓詞〉⁶⁵；由緒山本人撰寫的〈先妻敏惠墓誌銘〉而知其尚寫過〈先妻敏惠行狀〉；由緒山〈嶺南寄正憲男跋〉而知其曾受黃綰之託，「為文告師，請更今名」⁶⁶；此「文」及上面所說的「疏」，無疑皆應視為緒山佚文。此外，緒山還寫過一篇重要論文，即〈刻文錄敘說〉。但現已查明，《王陽明全集》卷首所載的〈刻文錄敘說〉只是嘉靖末年刊刻的《陽明先生全集》⁶⁷卷首所載的〈陽明先生文錄敘說〉的改訂本。而該改訂本無疑應屬緒山佚文，猶如王陽明的〈大學古本原序〉⁶⁸。不過筆者在調查過程中，也有些記載經核查後，被確認為誤判。如據葉樹望〈王陽明の後學錢德洪について〉一文記載，寧波天一閣藏有清

⁵⁹ 《石蓮洞羅先生文集》，卷9、卷11。

⁶⁰ 《玩鹿亭稿》卷4，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6冊。

⁶¹ 《東廓鄒先生遺稿》，卷13。

⁶² 《王陽明全集》，頁1335、1337。

⁶³ 〈寺觀〉，《寧國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民國八年涇縣崔氏寧郡清華齋刻本），卷14。

⁶⁴ 〈書院·水西書院〉，《涇縣志》（清嘉慶十一年刻本），卷8。

⁶⁵ 〈學校志·書院〉，《饒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同治十一年刻本），卷7。

⁶⁶ 《王陽明全集》，頁986。

⁶⁷ 全二十冊，其中正錄五卷、外錄九卷、別錄十卷，嘉靖三十六年序，江西贛州府上梓本，日本名古屋大學藏（見佐野公治：〈名古屋大學藏《陽明先生全集》について——王陽明〈文錄〉の一資料〉，《名古屋中國哲學論集》，2002年第1號，頁110-120）。

⁶⁸ 見〔明〕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95。釋文見拙著：《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6-58。

抄本《陽明先生宗印錄》，其中收錄的《錢德洪記》為緒山佚文。然筆者後委託方祖猷教授查實，該文並非緒山所撰之記文，而是其為王陽明《傳習錄》所做的紀錄，內容同於《傳習錄》卷三中錢德洪、王畿所錄之部分，故不能視為緒山之佚文。

三、生平簡歷

儘管錢德洪的主要著述已經失傳，但我們仍可以從錢氏同時代人或稍後人的來往書信、所撰序跋、墓誌、祭文等文獻當中，挖掘出有關錢德洪及其家族的諸多史實。基於這些文獻資料，我們可大致勾勒出錢德洪的生平簡歷，其中有多處不同於或詳於吉田公平先生所撰的〈錢德洪略傳〉⁶⁹。

錢德洪，本名寬，字德洪，為避先世諱，而以字行，改字洪甫⁷⁰。

弘治九年（1496）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餘姚龍泉山北麓之瑞雲樓⁷¹。因龍泉山古名緒山，又名靈緒山，上有緒山廟，遂以緒山為號，自稱「緒山居士」；又因其為吳越武肅王錢鏗的第十九代孫，故自詡「王公賢聖之後」。「少業舉子，從事晦菴《集注》、《或問》諸說」；十七、八歲時讀《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

正德十四年，「補邑庠弟子，舉業日有聲」，然下第未果，「遂輕進取，專心以學問為事」。

⁶⁹ 見《陽明學》，第5號，頁132-136。案：因這部分史料都已錄於本文或筆者所編的《徐愛·錢德洪·董瀝集》，故以下所述引文除本文或拙編未收之史料外，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⁷⁰ 吳越王錢鏗父名寬。然至少在嘉靖十年前後，緒山尚未以字行，如嘉靖九年其撰〈陽明先生詩錄序〉時自稱「門人錢寬」。鄒守益的〈四然翁贊〉作於嘉靖二十五年前後，亦稱緒山為「寬」（見《東廓鄒先生遺稿》，卷10）。然幾乎撰於同時的錢徽〈雲夜吟序〉，則稱其為「德洪」（參見《承啟堂稿》卷1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7冊，頁264-265）。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不一致，其原因恐怕在於鄒守益等江右學者知道緒山改名的消息要比浙中學者晚一些。據筆者推測，緒山不稱「寬」而稱「德洪」，應在嘉靖二十二年出獄歸鄉之後。但也有例外，如《四刻瀛山書院志》卷六〈三賢祠記〉的署名是「侍郎錢寬德洪」，末尾是「隆慶庚午五月緒山居士錢寬撰」，說明至隆慶四年，緒山仍在使用錢寬這一名字。

⁷¹ 張岱《於越三不朽圖贊》說錢氏為山陰人，有誤（見沈雲龍：《明清史料彙編》〔臺北：文海書局，1984年〕）。

正德十六年，陽明平宸濠歸越，「始決意師事焉」；及陽明歸餘姚省祖塋，經王正心引見，得以與陽明相識，此後力排眾議⁷²，「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然此時緒山尚未隨陽明居越，故有所謂「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惚可即，然未得入頭處」之自敘。

嘉靖元年，領鄉薦，中舉人，翌年下第歸，始「侍師於越」⁷³，並欲以陽明高足徐愛為楷模。

嘉靖三年，緒山攜二弟錢德周讀書越之城南，其父心漁翁往視之。

嘉靖五年，與王畿、金克厚同登進士，然不就廷試，引疾歸，卒業於陽明；凡及門者，陽明皆使緒山先引導之，俟志定有入，方與請見。

嘉靖六年九月初八日，緒山、龍溪訪張元沖於舟中，因論為學宗旨，兩人產生分歧，遂請教陽明，史稱「天泉辨正」和「嚴灘復申」；後緒山又「與四方同志相守（陽明）洞中，究竟此件事」。

嘉靖七年冬，緒山偕龍溪赴廷試，傳陽明病歸，迎至嚴灘，聞訃。與龍溪議服制，「緒山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龍溪請服斬衰以從」⁷⁴。

嘉靖八年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喪歸越，內訌外侮並作」⁷⁵，

⁷² 當時陽明的名聲並不太好，尤其在其家鄉餘姚。所以其弟子入門時常有遭到家人反對者，較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心齋與錢緒山。據史料記載：「王艮往謁陽明，請于父，不允。其父令禱雨，應，而後允行。」（〔清〕孫奇逢：《夏峰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303）而《陽明年譜》則謂：緒山「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陽明）先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眾議，請親命……」然心漁翁仍不放心，後又往越城規勸之（見《王陽明全集》，頁1282、1292）。如果說心齋父親只是想驗證一下其子去謁見陽明的禍福利弊，那麼緒山父親則是與家鄉故老一樣對陽明抱有疑慮和戒心。

⁷³ 緒山曾自稱：「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甚至還說過「事先生八年」（見《王陽明全集》，頁1468、1577）這樣的話。所謂「八年」是從正德十六年在餘姚認識陽明時算起，所謂「在越七年」是從嘉靖元年算起，二說皆有誇大之嫌。緒山本人曾在〈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中說：「後十年侍師於越，橫山子已遺世五年矣。」徐愛歿於正德十二年，「遺世五年」即嘉靖元年，至嘉靖六年十月陽明於桐廬岩灘告別緒山等人而奔赴兩廣，滿打滿算不過六年，何來「在越七年」？而從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也只有七年時間，又怎麼會有「事先生八年」？至於羅洪先所說的「錢子事先生最久」（見〈瑞雲樓遺址記〉，《石蓮洞羅先生文集》，卷13，頁6），則更屬臆測誇大之言。

⁷⁴ 〔明〕周汝登：〈龍溪〉，《聖學宗傳》（明萬曆三十三年刊本），卷14，頁24。

⁷⁵ 〈緒山錢子〉，《姚江書院志略》卷上，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第9冊，頁291。

遂「與龍溪相與保孤寧家，日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場，妥綏靈爽，約同志數人，輪守文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又稱天泉遺教）」。

嘉靖九年，薛侃「建天真書院，錢子與龍溪子合同志資為之繼」⁷⁶，並與龍溪「疊為居守」於精舍，以接引四方來浙者，並刻《陽明先生詩錄》於杭州勝果寺。

嘉靖十年五月，與龍溪「趨金陵，為正億問名」。黃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遂與龍溪復走天臺，「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⁷⁷。

嘉靖十一年，始赴廷試，「倡道京師，興起多士」，「樂取諸人以為善」；與龍溪「諸君相處益密，且眾至六七十人。每會輿馬塞途，至不能行，乃分處為四會，而江右同志居多」⁷⁸。後登進士第，「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同年秋，「問教學之道於甘泉子」。

嘉靖十二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⁷⁹。

嘉靖十三年，聘主廣東鄉試，薛侃前來問學。歸時，「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成〈征宸濠反間遺事〉⁸⁰；又「偕訪雙江子，聚諸友於崇玄、麗澤，乾乾惕若之功」⁸¹。三月，「李遂建講舍於衢麓……洪、畿乃與（王）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⁸²。

嘉靖十四年，「過金陵，與黃子綰、聞人子詮等議刻《文錄》，作〈購遺文書〉，搜獵於江、浙、閩、廣、直隸，乙未二月刻於姑蘇」⁸³。後又「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同年冬，丁內艱歸姚，與親友修復中天閣之會。

嘉靖十五年冬，服闋補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以明「大易之訓」。

⁷⁶ 同前註。

⁷⁷ 《王陽明全集》，頁1329。

⁷⁸ 王畿：〈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在菴王公墓表〉，《王龍溪先生全集》，卷20，頁34。

⁷⁹ 《王陽明全集》，頁1329-1330。

⁸⁰ 同前註，頁1474。

⁸¹ 鄒守益：〈崇玄壽言〉，《鄒守益集》，頁287。

⁸² 《王陽明全集》，頁1330。

⁸³ 〈緒山錢子〉，《姚江書院志略》卷上，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第9冊，頁291。

嘉靖十七年，陞刑部湖廣司主事，後轉陝西司員外郎。

嘉靖二十年，因依法奏武定侯郭勳⁸⁴死罪，觸帝怒，下詔禁，與御史楊爵、都督趙卿在獄中講《易》不輟⁸⁵。

嘉靖二十二年，詔革冠帶歸農，丁父憂。

嘉靖二十四年，撰〈慈湖書院記〉，「竊歎（慈湖）先生之學，直超上悟者乎」。

嘉靖二十五年，至江西安福，遊復古書院。季夏，「避囂西湖禪舍」，將自己所編的其父之詩集《雲夜吟》贈予錢徽，並向其「索序」。

嘉靖二十七年，與龍溪相約「會於水西，歲以春秋為期」⁸⁶，又為父心漁翁墓誌銘而赴廣東訪湛甘泉，「三日告歸」⁸⁷；六月，與龍溪聚合羅念菴於豐城⁸⁸；同年夏，與羅念菴等相會於廬山天池，並同赴「青原會」⁸⁹，其間順便為其父向東廓、念菴企撰祭文；會後同遊龍虎山，擇沖玄觀為「江浙同志大會」之會所⁹⁰；同年八月，朱衡等迎緒山「講學於精修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又「請洪作疏糾材」，建雲興書院⁹¹；九月，至廣東韶州，謁湛甘泉，並與之論學⁹²，後應陳大倫之邀，留明經書院講學⁹³，因尚在服喪期間，離家遠遊，引起湛甘泉、胡廬山

⁸⁴ 郭勳為明初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的玄孫，嘉靖十九年進勳為翊國公，加太師，權傾朝野。

⁸⁵ 有關史料中並無明確記載緒山入獄的具體時間，然據楊爵「與君同難兩年分」、「二載相逢一旦離」等詩句及〈獄中詩集序〉（見《楊忠介集》卷2，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6冊，頁11、104、115），可推定緒山入獄當在嘉靖二十年。

⁸⁶ 王畿：〈水西會約題詞〉，《龍溪先生會語》（明萬曆四年查鐸刻本），卷1。

⁸⁷ 此據湛甘泉「錢緒山秋官同諸友駱君舉、鄧天德、郭以平、黃如禮、黃如道、鍾體嘉來訪甘泉，三日告歸，予方登飛雲，遂與分袂，詩以送之：四千里路攜諸友，三日甘泉共一門。歲晚獨憐歸草草，飛雲月下未同論」（見〔明〕湛若水著，鍾彩鈞點校：《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臺北：國科會，2004年〕，第3冊，頁562）。

⁸⁸ 王畿：〈過豐城問答〉，《王龍溪先生全集》，卷4，頁2。

⁸⁹ 《王塘南先生自考錄》嘉靖二十七年條亦載：「錢緒山、王龍溪二先生自浙來，東廓先生邀入青原大會，九邑縉紳士人皆集，與會者七八百人，其徒步往聽教。」（頁12）。

⁹⁰ 羅洪先：〈夏遊記〉，《羅洪先集》，頁67。

⁹¹ 《王陽明全集》，頁1337。

⁹² 湛若水：〈天關語通錄〉，《湛甘泉先生文集》（清康熙二十年刻本），卷23，頁19。

⁹³ 據湛甘泉〈贈韶郡侯陳君豹谷考績之京詩有序〉載：「甘泉子日居西樵煙霞之洞，或有告曰：『為良知之學者錢子緒山，稱韶守豹谷曰陳子幾聖人矣，精誠感通矣。』又有告於甘泉子曰：

等的不滿⁹⁴。此事在甘泉與洗桂奇的答問中有詳細記載：「奇問：『秦幼貞承祖母重服，來卜居講學于樵，我師翁以為大孝矣。而錢緒山有親之喪，不遠四千里來講學，與秦子事一也，況錢子且為親求墓銘矣，我師翁則責之以禮，何耶？朋友會問，多致疑於此者。伏乞示教。』（湛答：）『先師（指白沙）有云：三年之喪，在人之情。秦幼貞承重葬後先來時，想在大小祥之間，其持喪太嚴，常獨靜坐密室，不與人言，惟啖薺鹽，不食肉。後歸迎母來山，又隔一年，其志實欲避地遷居，築樓奉母。其與錢洪甫之來大不同也，何疑焉？少汾說起此子來，令我傷心飲涕，有志不就，嬰疾而歸，今不知生死何如也，豈勝嘆哉！』」⁹⁵故此，緒山在韶州僅滯留月餘，遂冬踰庾嶺，與諸生鄧魯等謁陽明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以「共闡師說」⁹⁶。後應「俞尹迎請」，赴吉安，「會於永和，同志胥集」，名聲大振⁹⁷。

『豹谷子亦猶從良知之學，稱錢洪甫幾聖人矣，假年則化矣。』……語及於學，則猶若有遺憾之意於緒山者。」（《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續編大全》，第3冊，頁563）緒山在明經書院講學教化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⁹⁴ 《黃宗羲全集》，第7冊，頁605。案：湛甘泉愛以道學自飾，不僅打著興復古禮的旗號，隨處講學興禮，而且在細枝末節上對時人亦頻頻指責，以邀名譽。陽明曾礙於當地習俗，居喪之際以酒肉招待前來弔孝的賓朋，未必便說明不孝，豈料甘泉卻不惜辭費，親自致書責難，害得陽明只好回信自責了事（參見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69）。陽明去世後，甘泉成了學界「大腕」，緒山遭其斥責，所受壓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與江右地區相比，浙東在當時顯得較為開放，故在服闋期間，緒山不為舊習所縛，離家遠遊，在浙東恐非異常，而在江右卻屬大逆不道。故王時槐嘗曰：「喪禮尤廢，不但蔬食、外寢、廬墓罕見其人，甚至有墨衰晉謁上官，出賀親友，及赴宴聽樂，酣歌淫狎者……又有平居服御交遊，一摹江左吳越華靡之風，務為侈豔，且漸習為，圓轉流動，放達不羈，以為高致，遂使吾吉先輩澹樸淳龐勁直之古意，浸以蕩失。」（《西原會規十七條》，《友慶堂合稿》〔明萬曆三十八年刻本〕，卷6，頁27-28）而王時槐本人，則確實做到了在「執喪三年之內，未嘗聽樂與宴會，未嘗以縗服入公門」（《王塘南先生自考錄》，嘉靖二十九年條）；可謂嚴守禮制、中規中矩。與之相比，緒山的確顯得「圓轉流動，放達不羈」多了，而這不能不說與江左、江右的人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⁹⁵ 湛若水：〈答問〉，《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續編大全》，第4冊，頁142。

⁹⁶ 《王陽明全集》，頁1337。

⁹⁷ 鄒守益：〈贈竹溪林郡侯考績序〉，《鄒守益集》，頁184。案：據羅大紘《紫原文集》卷八〈玄潭重建真君閣及修文恭雪浪閣紀事疏〉載：「毗陵唐太史、會稽錢緒山、王龍溪、虔州何善山、黃洛村諸老，或五年，或十年，必一再至矣。」（《四庫禁毀叢書·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9冊，頁412）玄潭在吉安府，說明緒山去過吉安多次，時間大概在嘉靖、隆慶年間。

嘉靖二十八年初春，自廣東舟返，過螺川，王塘南「舟次聽教，至南浦而別」⁹⁸，其間舉「南浦大會」，「至數百人，留連旬日」⁹⁹。其間，相聚永和，為張元沖母親唐太恭人祝壽¹⁰⁰。五月，與龍溪同赴涇縣「水西會」，與會者達二百三十餘人¹⁰¹；會後又偕浙、徽諸友前往江西，與鄒東廓等在龍虎山沖玄觀共舉「江浙同志大會」¹⁰²；後又與龍溪、東廓等在安福共舉「復古大會」，會後「大聚於青原」¹⁰³。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史際在溧陽建嘉義書院，延請緒山主教事，緒山撰〈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並重刻《山東甲子鄉試錄》於嘉義書院；四月，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緒山「送王正億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¹⁰⁴，近溪約緒山、龍溪「大會於留都天壇道觀，竟不果行」¹⁰⁵；同年，「謀修王子年譜」於嘉義書院，緒山「分年得王子始生至謫龍場，越十年，接續其後，得三分之一，以丁丑以後五年屬羅子洪先」¹⁰⁶。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重陽，與龍溪一起訪戚南玄於南譙，舉「南譙會」；同年冬，與龍溪「再往南譙」¹⁰⁷；後在南畿增錄並刊刻《朱子晚年定論》¹⁰⁸。

嘉靖三十二年秋，呂懷聚徒於滁州陽明祠，「洪往遊焉」，並「與呂子相論致

⁹⁸ 王時槐：《王塘南先生自考錄》，頁12，嘉靖二十八年條。

⁹⁹ [明]王宗沐：〈與成井居年兄〉，《敬所王先生全集》，《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11冊，頁225。

¹⁰⁰ 鄒守益：〈達壽說〉，《鄒守益集》，頁445。

¹⁰¹ 王畿：〈水西會約題詞〉，《龍溪先生會語》，卷1，頁2。

¹⁰² 王畿：〈沖元會紀〉，同前註，頁4。案：此為龍溪所記，而據鄒東廓的記載，沖玄觀共舉「江浙同志大會」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見鄒守益：〈懷玉書院志序〉，《鄒守益集》，頁202）。東廓嘗曰：「東廓子與緒山子遊於瀧岡，雙江子肅客於崇玄之宮，四鄉同志自遠而切磋，蓋鐘氏預者五人焉。」（〈天申集序〉，《鄒守益集》，頁76）「瀧岡」、「崇玄宮」，估計皆為龍虎山之名勝。

¹⁰³ 鄒守益：〈惜陰申約〉，《鄒守益集》，頁734。

¹⁰⁴ 《王陽明全集》，頁1337、1340。

¹⁰⁵ [明]羅汝芳撰，程開祐重校：《盱壇直詮》卷下，《中國子學名著集成》（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第44冊，頁87。

¹⁰⁶ 〈緒山錢子〉，《姚江書院志略》卷上，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第9冊，頁291。

¹⁰⁷ 王畿：〈祭戚南玄文〉，《王龍溪先生全集》，卷19，頁3；〈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墓誌銘〉，卷20，頁21。

¹⁰⁸ 據永富青地考證，《朱子晚年定論》的單行本至少有三種：一是正德十三年袁慶麟序刻本，簡稱原刻本。二是嘉靖三十一年錢德洪增錄序刻本，簡稱南畿增刻本。據〈陽明年譜附錄〉載：

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為新得」¹⁰⁹。

嘉靖三十三年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於涇縣，舉寧國府六邑大會，禮聘緒山、龍溪「間年至會」；是年，於水西精舍刊刻《傳習續錄》，並「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於瑯琊山¹¹⁰。又據夏子羽《史惺堂先生年譜》嘉靖三十三年癸丑條和三十五年丙辰條，期間歙縣知縣史桂芳常與緒山、龍溪等人「相質正不倦」¹¹¹，表明緒山此間在徽州活動頻繁。

嘉靖三十四年，倭奴焚掠鄉居，緒山「作〈團練鄉兵議〉以贊成之。首薦門下士，今都督戚繼光、總兵梁守愚，卒賴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謝君曰：『始疑公儒門，不嫻將略，乃知善將將也』」。

嘉靖三十五年，與龍溪共「主水西會，往來廣德」¹¹²；同年四、五月間，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在蘄州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¹¹³，緒山遊學於此，遂「復取逸稿（指《傳習續錄》），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並易中卷為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而沈寵則「屬洪撰〈仰止祠記〉」¹¹⁴；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史）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王陽明全集》，頁1340）因〈年譜附錄〉所記要晚於錢德洪〈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二十年，故應以錢序所稱嘉靖三十一年為是，而〈年譜附錄〉所記則可能是錢氏年久記憶有誤所致。三是嘉靖三十八年懷玉書院周倣重刻本，今安徽省博物館所藏的《朱子晚年定論》，即為該本，內載錢德洪分別撰於嘉靖三十一年和三十八年的〈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和〈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該本卷上內容與《陽明全書》本完全一致，卷首載：陽明先生原錄，後學成都周倣重刻，臨安黃紋校正。卷中和卷下的卷首皆載：後學餘姚錢德洪增錄，成都周倣重刻，臨安黃紋校正；卷末載：院生董良材、陳維新監刻，潘應奎、徐諫之、李道福、程一麟校錄（見永富青地：〈錢德洪《朱子晚年定論》について〉，頁5-15）。

¹⁰⁹ 《王陽明全集》，頁982。

¹¹⁰ 同前註，頁1345-1346。

¹¹¹ [明]史桂芳：《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7冊，頁472。

¹¹² 《王陽明全集》，頁1348。

¹¹³ 蘄州在楚地，今屬湖北長江以北、蘄春以東地區。黃宗羲說緒山「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黃宗羲全集》，第7冊，頁254）其中楚之奧地，疑即指蘄州之崇正書院。此前，緒山還曾於嘉靖十七年擔任過刑部湖廣司主事，偶赴楚地，然屬公幹，恐與講學無關。

¹¹⁴ 《王陽明全集》，頁126、1348-1349。

同年，「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¹¹⁵。

嘉靖三十六年，黃九成移居天真書院，從緒山、龍溪遊，「緒山大器之，（黃）公因執贊為弟子，願終身稟學焉」¹¹⁶；同年，再至青原復古會。

嘉靖三十七年，龍溪過宛陵，定會於水西，與緒山分主教席¹¹⁷；同年，「應當道聘主懷玉之教事，諸生悅其教，惕然有省也」；後王守勝等構屋於十五都，建文麓精舍，三年後，御史張浮峰更名為「緒山書院」¹¹⁸。

嘉靖三十八年，王宗沐延請緒山、呂懷至懷玉書院主教事¹¹⁹，並應邀為懷玉書院《朱子晚年定論》重刻本作序。

嘉靖三十九年春，「復約於懷玉，同志自遠而集，凡百餘人」¹²⁰。其間，鄒東廓亦赴緒山懷玉之約，偕劉獅泉、陳明水、管南屏等「論致良知之學於信之聞講堂」¹²¹；會後緒山又推介東廓去越地祭掃陽明墓¹²²。同年，「督撫胡宗憲建（錢

¹¹⁵ 鄒守益：〈勉董明建兆明諸友丈量〉，《鄒守益集》，頁533。案：此事《東廓鄒先生遺稿》卷四〈天真書院改建仰止祠記〉亦有記：「嘉靖丙辰（三十五年），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修陽明先師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摹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可見緒山還為天真書院撰寫過〈仰止祠記〉。仰止祠即陽明祠，一般設於各地王門弟子所建書院中，緒山可能分別為天真、崇正等書院撰寫過〈仰止祠記〉（如為混元書院寫過〈仰止祠碑記〉），抑或一篇多用亦有可能。

¹¹⁶ 焦竑：〈參議黃公傳〉，《澹園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10，頁926。

¹¹⁷ [明]沈懋學：〈王龍翁老師八十壽序〉，《郊居遺稿》卷5，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3冊，頁659。

¹¹⁸ 〈藝文三·雜著〉，《饒州府志》，卷28。

¹¹⁹ 王宗沐：〈懷玉書院碑〉，《敬所王先生全集》，《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11冊，頁357。

¹²⁰ 鄒守益：〈懷玉書院志序〉，《鄒守益集》，頁202。

¹²¹ 《鄒東廓先生文集》卷首，呂懷序。案：據鄒守益說：「江浙同志大會，初舉於沖玄，再舉於懷玉，予與劉師泉、陳明水束裝而赴焉。」（〈烏土溪水利記〉，《鄒守益集》，頁412）又說：「先師雲亡，浙江（指浙江與江西）為大會，以振微言。己酉會於沖玄，庚申復會於懷玉。懷玉高邃，無力者不能往，乃會徽、寧、蘇、湖。」（〈廣信講語〉，《鄒守益集》，頁726）而這兩次全國性的學術大會，都與緒山密切相關。

¹²² 據鄒守益〈書同志諸生謝石磯梁翁冊〉：「嘉靖庚申春，予年七十矣，念陽明先師墓道久曠灑掃，而同志約江浙大會於懷玉之上，梅林胡總制方靖海寇，修天真書院，介緒山子以請，遂乘興赴之。聚靜寺，謁蘭亭，歷武夷以歸，而勞與暑並，為痰火所困，延石磯梁翁療之。」（《鄒守益集》，頁866）

王）祠於靈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孫德洪者守之」¹²³。時緒山「閑住吳越國」，「念先德不白，往來於懷」，遂編刻《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於杭州。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赴江西，「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向諸生評論念菴之學，「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十一月至廣信懷玉書院，與念菴考訂《陽明年譜》稿。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譜成」¹²⁴；五月，緒山持《年譜》稿復訪念菴，延請念菴為譜作序。

嘉靖四十三年春，與王宗沐共舉「赤城會」，歸趨天真書院；十二月十六日，葬妻諸敏惠及長子錢應度、次子婦王氏於餘姚。

嘉靖四十四年，「作〈願閑疏〉，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遊，相期同志春秋會於天真」。

嘉靖四十五年，刻陽明《文錄續編》六卷並《家乘》三卷（後改稱《世德記》）於嘉興¹²⁵。

隆慶四年春，王時槐北上過浙，謁緒山於錢王祠，謂「錢公論學諄切」¹²⁶；同年五月，撰〈瀛山三賢祠記〉，讚歎朱熹〈題方塘詩〉乃「朱子悟道之言」。

隆慶六年九月，協助浙江巡按謝廷傑將自己所刪訂的《傳習錄》上、中卷，以及當時已「各自為書，單行於世」的《傳習續錄》、《文錄》、《別錄》、《外集》、《續編》、《年譜》和《世德記》，「合梓以傳」，並遵謝命把《朱子晚年定論》「附《語錄》（即《傳習錄》）後」¹²⁷。

萬曆元年，居杭州，患病身衰，次子應樂力勸其歸姚養病。

萬曆二年九月，「念同志之會，忽戒僕，束裝西遊，寓先祠表忠觀」。同年十月二十七日¹²⁸卒於杭州錢王祠，享年七十九；逾十日，次子應樂扶輓還姚，十二

¹²³ 張岱：〈西湖夢尋〉，《陶庵夢憶》，頁242。

¹²⁴ 〈緒山錢子〉，《姚江書院志略》卷上，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第9冊，頁291。

¹²⁵ 《王陽明全集》，頁1352。

¹²⁶ 王時槐：《王塘南先生自考錄》，頁23，隆慶四年庚午條。

¹²⁷ 《王陽明全集》，頁127、967；《四庫全書總目》，頁1498。

¹²⁸ 《明儒學案》稱：「十月二十六日卒。」（《黃宗羲全集》，第7冊，頁254），有誤。

月三日，葬勝歸山玉屏峰下，門人蕭良幹題曰「大儒緒山先生之墓」¹²⁹。

萬曆三年春，門人查鐸與俞允升、程平甫、蕭以寧一行四人「由武林弔緒山先生」¹³⁰。

萬曆十五年，涇縣水西書院毀後重建，祀陽明，以心齋、東廓、南野、緒山、龍溪配祀¹³¹。

¹²⁹ 據筆者所知，王門中被稱作「大儒」的，除了徐愛（見《王陽明全集》，頁984）、徐階（見李材：〈答存翁徐老先生書〉，《觀我堂集》〔明萬曆十五年顧憲成序刊本〕，卷13），也就是錢德洪了。說明緒山在王門弟子的眼裏，是能與徐愛相匹配的人物。案：許孚遠亦被譽為「名德大儒」（見許孚遠：〈葉向高序〉，《敬和堂集》〔明萬曆二十三年刻本〕，卷首），然徐氏並不屬於正宗的王門學子。

¹³⁰ [明]查鐸：〈龍溪先生會語後序〉，《龍溪先生會語》，卷首。

¹³¹ [明]張堯文：〈復建水西書院記〉，《涇縣志》，卷9。